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 (甘) LK000009

甘肃省情

GANSU SHENGQING



1

2021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主办

甘肃省情

2021 年第 1 期

(总第 133 期)

2021 年 3 月 15 日编印

主 编 杨文福

副 主 编 鲜 鹏

高继明

责任编辑 张雅丽

发送范围

党校(行政学院)系统

Contents

目 录

经济分析

河西走廊如何承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研究 宋学勤(1)

调查与研究

关于“数字甘肃”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4)

甘肃贫困地区产销体系建设情况调研报告 (7)

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史晓寰等(14)

观点摘编

“十四五”甘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等 10 则 (22)

金融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金融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张 辉(24)

甘肃省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金融思考 赵先立等(27)

“三农”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甘肃省农村污水治理投资模式研究 王彩艳等(33)

社会发展

甘肃省老旧小区改造情况调研报告 康 宾(37)

甘肃居民收支与生活状况报告 黄馨仪(43)

信息窗

我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等 13 则 (47)

河西走廊如何承接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研究

宋学勤

一、河西走廊承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最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在丝绸之路兴衰演进中，作为我国最早向西开放的窗口—河西走廊一直承担和扮演着内地与新疆，乃至中亚、西亚等地人口交往迁徙、经济贸易往来、多元文化交融、各民族共生共荣、东西宗教融合发展的重要角色。从历史到今天，河西走廊不论是作为历朝历代经略西北疆域、实现国家“大一统”的“国家走廊”，还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形成发展的“民族融合走廊”，亦或是作为对外开放的丝路要道和“贸易走廊”“文化走廊”，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融合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承载了国家“多元互构”或“卯榫”的功能。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和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政策实施，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重大标志性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必将成为内地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核心区和向西开放的国家战略大通道。以这一战略大通道为主轴向两翼辐射，南连青海，北牵蒙西，纵向上可以把华北、西南与西北连起来，形成新时代向中亚、西亚、南亚甚至欧洲的内陆进出口大通道。这个大通道对国家实施向西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对承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形成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对巩固新疆长治久安、促进西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河西走廊发展带来新机遇。

第一，将有力提升河西走廊国家能源大通道的战略地位，对未来国家能源安全起到战略保障作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是对我国打破能源资源进口“马六甲困局”和有效破解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海上能源安全通道的钳制与威胁的必然选择。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将我国与中东主要石油产地和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中亚相连接，是对我国现有中俄油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重要补充，将有效增加中国能源从西部进口的通道和数量。河西走廊若建成承接从新疆口岸进口的国家能源输送、战略储备和加工基地，对保障国家能源供给、降低能源进口风险和新能源调峰等方面都具有战略作用，同时也将有力提升河西走廊国家能源安全大通道的战略地位。假如未来国际能源供应突然中断或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安全时，将会起到平衡供需、抑制价格、抗拒风险和保证安全的作用，具有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后方与前沿的战略作用。

第二，将有力带动河西走廊，乃至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我国向西扩大开放提供了通道和平台。走廊的建成将改善我国西部内陆与外界的连通性，提高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加快我国西部内陆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力带动河西走廊发展开放型经济，同时大大提升我国西部地区的战

略地位,对维护我国西部战略安全、地区稳定、民族团结、削弱“三股势力”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将大大加快河西走廊现代农业、冶金石化和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走出去步伐。产业合作和产业园区建设已成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项目。2018年底,在中巴共同发表的《加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新时代更紧密中巴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中,双方将重点转向产业合作,旨在改善民生,促进农业、渔业和先进技术产业合作。河西走廊农业生产相对发达,文化旅游资源独特而丰富,冶金石化工业体系完备,承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将给河西走廊现代农业、冶金石化、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走出国门提供合作发展机遇,为区域经济加快发展注入新活力。

三、河西走廊承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的对策建议。

第一,争取国家在河西走廊设立向西大开放的新平台

1. 积极争取国家设立“河西走廊—哈密生态经济区”或“河西走廊生态经济区”。河西走廊至哈密段不仅是我国丝绸之路、向西开放和保障未来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大通道,也是承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的关键节点,更是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撑平台和向西大开放的安全稳定器,鉴于该区域承担着关乎国家向西开放、国土安全和能源安全的战略重任,甘肃应与新疆沟通衔接,共同呼吁,争取国家设立“河西走廊—哈密生态经济区”或“河西走廊生态经济区”,研究编制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争取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同时,为缩小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东部地区差距,请求国家从政策层面出台倾斜政策给予最大力度的支持,确保其建设顺利。

2.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设立有色金属、文化旅游、特色农产品等项下的自由贸易区。以金昌为中心,充分发挥金川集团矿产资源加工优

势和跨国经营优势,面向“一带一路”,设立有色金属项下的自贸区,鼓励以有色金属为主的矿产项下研发、设计、标准、金融等服务业走出去;以敦煌为中心,立足河西走廊富集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设立文化旅游项下的自贸区,打造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使河西走廊的文化旅游沿着“一带一路”早日走向世界;依托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丰富优质的特色农产品资源,建立以张掖、酒泉为核心区的我国第二个特色农业项下的自由贸易片区(第一个为陕西杨凌),支持建设特色农产品生产出口基地,鼓励开展面向中亚、西亚和中东欧的以特色农业为主的农业项下研发、设计、技术、装备、标准、金融等服务走出去。

第二,争取国家支持把河西走廊构建为国家西部战略安全保障基地

河西走廊地处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合地带,既是中原连接新疆以及中亚的交通要道,也是我国将西部油气资源输往内地的战略能源通道,更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被称为陆上马六甲海峡。将该区域打造成维护国家通道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的支撑基地,对于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能力,扩展国家发展的战略安全回旋空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构建互联互通的通道安全体系。随着新疆库尔勒到若羌到青海格尔木、新疆喀什和田到若羌等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将构建起内地进疆的南(成都经格尔木到库尔勒)、北京经巴彦淖尔到哈密)、中(兰州经河西走廊到乌鲁木齐)三条大通道的新格局,这一新格局的形成将大大提高进疆通达能力和运输效能。加快河西走廊大通道(中通道)与进疆南通道、北通道的互联互通,打通断头路、瓶颈路,真正构架起河西走廊连接新疆南疆、青海、内蒙西部的交通网络体系,对保障国家西部通道安全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甘肃应与新疆、内蒙沟通衔接,共同向国家呼吁规划建设敦煌到若羌、金昌到鸣

力吉(内蒙古柯拉善左旗)、敦煌到柳园、玉门到马鬃山(肃北)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并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2. 构建国家西部能源安全保障基地。在加快西油西气东输管道、西电东输线路和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和利用酒泉地区能源战略地位突出、地广人稀、生产区域远离当地居民区、建设成本低、储备方式战略安全性高、玉门油田采空区资源丰富、石化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规划建设国家级石油加工储备基地、天然气地下储备基地、西部煤炭储备基地、内陆河流域末端核电站、绿色化工示范园区等。特别是要论证利用玉门油田采空区建设地下储气库的技术可行性,构建多层次的能源储备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3. 构建绿色丝绸之路生态安全屏障。河西走廊区域干旱少雨,生态极其脆弱敏感,加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地方财力薄弱,要从根本上改善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建设河西走廊生态示范区,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建立国家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生态保护与建设资金投入,全方位推动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唯此才能有效推动该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性改善和恢复,也才能真正构筑起绿色丝绸之路生态安全屏障,进而确保国家战略通道的生态安全。

4. 构建数字丝绸之路信息安全基地。依托河西走廊区域具有的战略纵深较大、高原气候冷凉、土地资源丰富、电力供应充足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建议规划建设国家级的数据镜像中心和数据交换中心,并增设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架设专用通信链路,实现中国西北与西南等地区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为构建数字丝绸之路提供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争取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大建设项目

1. 国家级油气资源战略储备和加工基地建设

项目。以老玉门市为中心,建设总容量不少于600万立方米的国家大型战略石油储备库(地上),在玉门老油田采空区建设10~20亿方的大型天然气储气库群(地下),同时规划建设2000万吨以上的石油化工加工基地。

2. 保障通道安全的互联互通交通建设项目。打通河西走廊进入南疆的新通道,即敦煌经阿克塞至若羌的铁路、高速公路;打通河西走廊连接入疆北通道的横向联络线,即金昌至乌力吉(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铁路、高速公路。

3. 河西走廊有色金属、文化旅游、特色农产品等项下的自贸区建设项目。以金昌为中心有色金属项下的自贸区;以敦煌为中心的文化旅游项下的自由贸易区;以张掖、酒泉为核心区的特色农业项下的自由贸易片区。建设河西走廊绿色农产品出口基地和河西走廊国际智慧旅游示范区。

4. 绿色丝绸之路生态示范区建设项目。建议国家“十四五”期间整合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山水林田湖草、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等方面资金,加大支持力度,规划建设河西走廊生态示范区,加快构筑起绿色丝绸之路生态安全屏障。

5. 高速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项目。以金昌、酒泉正在建设的丝绸之路大数据中心为基础,建设国家级的数据镜像中心、数据交换中心和数据备份中心,并将其增设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规划建设从金昌或酒泉出发,直达广西、重庆、贵州、陕西、青海、新疆、宁夏的专用通信链路,实现中国西北与西南等地区的互联互通、中西亚与东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

(摘自《甘肃工作》2020年第10期)

张芳胜/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宋学勤,民革甘肃省委会调查研究室主任。

关于“数字甘肃”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省政府参事室调研组

一、“数字甘肃”建设取得的成效

近几年来,我省以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社会管理、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和便民惠民服务水平为核心,积极推进“数字甘肃”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突出表现在:

基础网络建设方面:建成 19.38 万公里长的传输网络,实现全省城乡 4G 网络覆盖和光网宽带覆盖;建立了省市两级电子政务云平台;建成兰州新区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兰州新区“丝绸之路大数据产业园”和云计算服务中心(西北中小企业云)。

互联网+方面:电子政务服务网覆盖全省乡以上政府机构,全省 80% 的政务服务事项可在该网上办理;建成全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初步形成国家、省、市三级数据共享交换体系;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覆盖了全省 84 个县区、6220 个村的 132 万户、552 万人、近 10 万名政府工作人员,该平台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汪洋主席的高度评价,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兰州作为全国 5G 试点城市,已完成了 5G 规模组网实验,全省也已具备 5G 规模组网条件;工业互联网发展初见成效,物联网连接规模已突破 100 万户。还有行业方面的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全省高校智慧校园平台、中小学智慧云校园平台和集约同步课堂平台,三农大数据中心和三农管理平台,智慧旅游平台——一部手机游甘肃,智慧城市公众门户——爱城市等,让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数字化的优越。

二、“数字甘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思想认识滞后。许多人对信息化促进

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刻,甚至观念守旧、故步自封,连信息化、数字化的有关基本知识都不知晓。调查问卷显示,不知道表达传输信息是使用 0 和 1 两位数字这一基础常识的人多达 37.5%,认为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的人占到 40.4%,在社会上,有的认为“数字甘肃”是在玩数字,不踏实,思想上不接受,行动不积极。有的认为甘肃落后,“数字甘肃”建设只能跟着别人走,等等看、慢慢来。有些市县政府对数据应用及服务的关注程度不够,很多企业不愿意对设备数字化改造及“上云上平台”增加投入。

(二)基础建设薄弱。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普遍选址难,尤其是社区、公共场所、市政管道进入难,还有流失率高、屋顶承载受限、物业协调难等问题。

(三)各自为政。信息化建设缺乏全面的整体规划,省市县三级信息化建设主管单位及审批单位不统一,普遍没有一个牵头机构。政出多门导致重复建设相当严重,“你有什么、我也有,免得到时候还要给人下话”。单位专网林立,运维成本高。有一个地级单位,拥有 4 套会议系统,开不同的会议就用不同的系统,连配置的屏都不一样。调查问卷显示,48.5% 的人认为我省目前的信息收集处于一般水平,30.9% 的人认为收集不全面。

(四)发展不平衡。首先是企业之间数字化发展不平衡。只有少部分企业达到了工业 3.0,应用了 ERP、MES 等系统,特别在生产过程智能化控制、供应链优化、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

等方面数字化程度不高,智能制造规模小、总量少。其次是各地各部门发展不平衡。再次是与事、物的数字化相比,“人”的数字化明显滞后和薄弱。调查问卷结果显示,61%的人认为我省目前的数字化处理技术一般,25%的人认为落后。

(五)难以整合共享。许多部门和企业掌握的信息分散孤立,信息系统相互割裂,缺乏支撑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设施平台、技术标准和政策措施。信息的采集、计算、存储一般都只以满足各部门自身需求为主,普遍呈现“烟囱”和碎片化、孤岛型状况。政务外网与政务专网全面对接融存在职能交叉。

(六)服务功能欠完善。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程度不高,事项办理一次录入未能完全做到,电子证照应用成效不明显,有些群众和企业重复提交材料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

(七)大数据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乏力。全省大数据产业的总体量很小,且布局分散,未形成规模效应。大数据产业的一些龙头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带动引领示范作用发挥不明显。网络管理机制不健全,信息安全体系、立体式网络防护体系尚未建立。

(八)人才支撑不够。信息化企业不同程度存在人才缺乏问题,尤以高端人才更为严重匮乏。不但人才外引很难,而且省内高校毕业的信息化人才也纷纷流向发达城市。

三、加快“数字甘肃”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认识,增强决心。可以说,在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不懂数字化就是当今的新文盲,不研究解决数字化问题就会落伍。各级政府和各企业都应该对“数字甘肃”给予高度重视,列入重要议程,统一认识、提高站位,早抓、狠抓、抓精细,务必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把组织调整和“充电”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在市县领导班子中充实一批掌握信息技术的年轻干部,逐步改变对信息技术不懂得、不认识的盲从状况。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让民众都清楚,每个

人都是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只有主动接受新的理念,及时掌握应用新技术,才能紧跟形势的发展,同时使生活更美好。

(二)统力协作,跑步跟进。在准确评判甘肃数字化定位的基础上,制定科学规划,统筹使用力量。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敷设电信线路或设置小型天线、移动通信基站过程中,涉及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建筑物以及公共设施时,应免费放行。政府应牵头组织收集各行业需求,搭建5G应用收集、研发和部署的桥梁,以便5G网络产品快速转化。各相关企业都要进一步创新数字智能技术与服务,创新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实现规划做出贡献。

(三)夯实基础,强化支柱。积极扩展以NB-IoT、eMTC等技术为代表的移动物联网,着力推进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云办公平台建设,及时更新相关的各种软硬件,以保证稳定高效的光网络支撑。持续推进数据采集和分类工作,深化甘肃基础数据库的数据采集、传输、使用。推进宽带网络升级和“全光网城市建设”,支持运营商实施高速大容量光通信传输系统适度超前建设,提升网络能力。在热点地区不断增加网络容量,尽可能把优质的网络信号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建设一体化移动政务服务,实现掌上办事,构建APP系统管理。要将农民对农资及其他工业品的需求上行到互联网,努力解决农村信息化落后问题。

(四)资源共享,互联互通。要加快技术融合和数据融合,形成覆盖全省、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健全全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完善共享应用机制和共享目录,推进全省政务服务“一张网”办理,加快实现“一网通办”和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要建设信息基础平台,统一数据模型、统一数据目录、统一基础数据,实现统一的用户管理、数据交换、地图服务、数据访问和应用门户等功能。要在部门之间也建立完善信息共享的标准规范和操作流

程,建设一体化、网络化综合支持的大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推进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的互联互通、共享公用、协同管理和服务,为各级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提供全方位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五)多元融合,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要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加快培育行业级、区域级、企业级等多级以及石油化工、能源矿产、供应链物流等具有产业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推动各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开发满足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需求的多种解决方案,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上狠下功夫,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尤其在制造业方面,要推动积极培育众创设计、个性化定制、服务性制造等新模式,衔接行业断层,完善产业链,推动价值链重构,打造新型制造体系。要强化大数据对农业的服务,培育互联网农业、智慧农业。

(六)补齐短板,实现平衡发展。一是行业平衡。进一步打造大数据应用体系,从政务惠民、城市管理、产业发展三个方面,全面提升我省整体智慧信息化水平,为政府各部门和广大群众提供多种智慧类应用服务,打造一个智能、绿色、高效、便捷的“美好新甘肃”。二是尽快将“事”与“物”的数字化聚焦到“人”这个中心上来,真正做到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融合。三是完善网信安全体系。加强安全防控,实施从数据的形成、存储到数据的传输、应用以及共享全过程监管。要构建多层次安全保障体系,实时监控网络安全态势,强化评估风险,并进行数据研究判断,建立安全应急机制。各行业要对涉

密系统和非涉密系统进行合理定级,并按照内网分级保护、外网等级保护的要求,对安全管理、身份鉴别、安全防护、安全备份等内容认真进行检查整改,保证形成互补有效、自主可控的安全体系。

(七)落实政策,加大扶持力度。要将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承诺配套的资金落实到位,并尽可能增加财政投入。要切实执行大工业电价政策,落实全省新建基站及数据中心建设用电计费模式由现在商业用电电价改为大工业用电电价,并给于一定的电费补贴;确保基站电费按照一次供电模式计取,避免相关业主单位收取二次转供电费用。

(八)人才领先,依靠创新驱动。搞好“数字甘肃”建设最关键的是人。因此,要高度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政府部门要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大胆支持,引导与国内先进平台厂家、院校合作,优先引进高端人才,并对其给予住房、补贴、落户、子女就学等优惠政策。各专业信息企业、科技企业都要承担建设“数字甘肃”的使命和责任,积极创新、加强合作,以舍我其谁的决心攻坚克难,以勇争一流的魄力创出品牌。同时要积极培育本土数据信息产业专业人才。建议省上举办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数字化培训班,提高他们这方面的素质能力,并定期组织干部到数字化搞得好的地方现场参观学习,开阔眼界。要坚持数据开放、市场主导,以数据为纽带,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培育造就一批大数据领军企业,打造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队伍。

(摘自《调查与研究》2020年第10期
张芳胜/摘编 井虹/校)

甘肃贫困地区产销体系建设情况调研报告

中共甘肃省委财经办

一、近三年多来的总体进展

(一)强化生产体系建设,产品保供基础稳步夯实。种养规模和效益快速提升,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特色种养产业带逐步形成。近两年累计整合落实到户种养产业资金 188.8 亿元,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 109.4 万户。健全企业牵头、合作社组织、订单种植、最低价收购的带贫机制,带动 52 万贫困户融入现代农业体系。开设 89 个特色产品保险品种,参保农户 174.5 万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94.9 万户,贫困户缴费占总保费的 10%,降低了贫困户产业风险。各地主导特色产业呈现出集约化、规模化、品牌化态势,平凉市累计发展果园 205 万亩,面积和产量均占全省 40% 以上;定西市中药材种植面积 180 万亩,年交易量 100.8 万吨、交易额 200.4 亿元;天水市果品、蔬菜面积分别达 350 万亩、135.3 万亩,产量分别达 365 万吨、390.2 万吨,综合产值分别达 123 亿元、120.5 亿元;陇南市核桃种植面积达 436 万亩,居全国主产市州第三位。

(二)强化主体培育,产业规模效应得到逐步显现。各地注重在产业发展各环节引进龙头企业,贫困地区累计培育龙头企业 2881 家,运营规范和较规范的贫困村合作社占 70% 以上,加大扶持农业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室覆盖所有行政村,累计发放特色产业贷款 925 亿元、农产品收购贷款 365 亿元,支持农业市场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由生产向加工、流通、消费领域延伸,大型龙头企业在壮大产业规模、

带动产业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地借鉴推广“庄浪模式”、“宕昌模式”,发挥国有平台公司、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各方主体作用,集约联动发展,利益多方共享。庆阳市与中盛、圣农、正大、海升等企业集团合作,大规模发展肉羊、肉鸡、生猪、苹果产业,效果初显。

(三)强化冷链物流建设,产品议价能力进一步提高。把加强保鲜库建设作为解决价贱伤农等问题的重要抓手,加强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冷链库容达 810 万吨,有需求的贫困县建成保鲜库 1019 座,购置冷藏车 222 辆,延长了产品贮藏期和货架期,提高了市场议价能力,推动错峰销售和常年均衡供应。静宁县引进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投资 5 亿元,建设省内规模最大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冷链物流产业园和苹果期货交割仓库,在全国建成直销网点 10 处,实现苹果生产、储藏、检验、销售一条龙服务,推动了静宁苹果产业转型升级。“静宁苹果”品牌评估价值达 140.25 亿元,连续 15 年在国内畅销,引领全国苹果市场产地价格。

(四)强化市场建设,产品交易组织化程度明显增强。加快建设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改建提升乡镇农贸市场,为农产品出村、出镇、出省、出海搭建平台载体。定西马铃薯综合交易中心、陇西首阳中药材交易中心、天水藉口果蔬交易市场、武山洛门国家级蔬菜批发市场等大型商品交易市场,聚集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初步形成了产品集散、物流加工配送、数据汇集和价格形成中心,推动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甘肃中药材交易中心深化国家首批供应链

创新与应用试点,创新完善供应链平台,依托仓储设施实现在线交易、交割、融资、支付、结算等一体化服务,初步形成全国 17 个产地库和销地库仓储服务网络,年线上交易额超 10 亿元。泾川县富原红果品公司在广州等地设立直销窗口、在泰国设立分公司,果品出口 17 个国家和地区,去年销售收入 1.3 亿元。

(五)强化新型电商服务,产销对接更加精准有效。全省 75 个贫困县实现电商服务中心全覆盖,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累计争取实施 66 个,94% 的贫困乡镇建成服务站,80% 的深度贫困村建成服务点。发挥电商信息流、物流快捷优势,构建产品营销“高速公路”,培育电商人才,推广网红带货,实现跨区域产销对接。陇南推进贫困村“一村一店”建设,全市累计开办网店 13555 个、微店 9600 多家,电商年交易额 130 多亿元,带动 22 万人就业。礼县良源公司去年电商交易 9100 多万元,其中跨境电商交易 570 万美元,电商平台线上直播带货成为当下最活跃的交易行为。

(六)强化品牌建设,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攀升。各地普遍重视品牌建设,推进标准化生产,加大两个“三品一标”认证认定力度。实施品牌营销战略,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抱团出省、主动出击,对接京津沪、粤港澳、成渝等终端市场,携手推动“甘味”产品走出去,在省内外建立销售专档、专柜、专区 170 个,在北京、广州等地设立 10 个“甘肃省农产品销售服务中心”,依托东西协作消费扶贫打造“甘味窗口”,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明显提升。全省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累计达 2393 个,发布“甘味”区域公用品牌 50 个、企业商标品牌 150 个,10 个“甘味”农产品入选 2019 年中国农业品牌。武山韭菜、蒜苗、豆角等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番茄等 13 类蔬菜和 32 个产品被认定为国家 A 级绿色食品。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生产环节

一是标准化基地建设融资困难。一些龙头

企业反映,建设现代化矮砧密植苹果园每亩大约 2.5~3 万元,农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3 年后挂果产生效益,第 5 年开始营利,企业前期投入资金压力大。但农业企业以果园建设形成的生物资产评估价值低,银行放贷额度小,而且商业银行的放贷期限基本为 3 年以内且一次性偿还。宁县某合作社负责人反映,他的果园加资产价值评估 5100 多万元,在银行抵押只贷出了 300 万元,所获资金与需求相差甚远。与融资困难形成对比的是合作社经营和带贫压力比较大,不少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使用产业到村到户资金,向村集体和贫困户按股分红,但是各地分红比例从 6% 到 12% 不等,一些合作社分红比例太高。

二是规模化程度不高、盲目性较大。农户分散的种养殖规模都比较小,加之对市场信息不掌握和判断失灵,存在盲目扩大种植规模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导致供大于求,丰收而不能增收。平凉市 205 万亩苹果果园中,农户分散经营面积占 85%,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面积仅占 15%。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格局,在信息共享、资源共用、技术服务等方面存在缺陷,既不利于小果农与大市场的对接,又不利于统一管理、推广新技术和降低务作成本。安定区香泉镇党委书记说,高原夏菜种植是全镇的主导产业之一,但由于合作社规模普遍较小,大部分土地为农户分散自种,一些工商资本在菜价高时大量流转农户土地“一哄而上”种菜,往往是量少而价高、价高而量少,农户种植收益不稳定。

三是农业人才缺乏。定西马铃薯研究所负责人反映人才引进困难,财政补贴的民生就业项目安排的大学生来了留不住,公司自己引进培养的大学生平均年薪 7~8 万元,但享受不了财政补贴,政府的就业项目与公司实际需要不匹配。各地普遍反映农技人员和农村科技带头人较少,农技普及缺失。静宁县现代苹果高新技术示范园负责人说,县乡不到 200 名的农技

和科技人员要负责全县 80 多万亩的苹果和其他作物的技术指导,力量严重不足且基本都在 45 岁以上,年轻的农业科技人才基本断档了。

四是产业基础配套比较薄弱。秦安县刘坪镇 4.5 万亩耕地中有 4.1 万亩是果园,老百姓对产业路的呼声很高,全镇林果基地需建设 3.5 米宽并且带排水渠的沙化产业路 210 公里,资金需求量巨大且没有配套资金。礼县农花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反映,去年合作社在城关镇流转农户旱地种植辣椒,修建了通往种植基地的道路,但需要用三轮车往基地拉水灌溉,付出了巨大成本,亟待配建小型灌溉设施。

五是机械化水平低。定西、平凉的山区地块狭小,被农户称为“皮带地”,能够享受补贴的大型农机难以进地作业,种植中药材和苹果等劳动强度很大。甘肃陇上草牧业公司经理反映,公司流转农户土地种植牧草,但是适合小型地块的农业机械比较缺乏,人工成本很高。而据定西三牛农机公司人员介绍,公司研发生产了多款可供山地使用的小型农业机械及配套器具,但由于没有能够纳入农机补贴范围,农户购置费用较高,销量有限。

(二)加工环节

一是建设资金缺乏。甘肃陇浆源农业公司订单收购武山县 7 个合作社 1054 户农户种植的山野菜,研发加工深受市场欢迎的浆水酸菜产品,市场订单源源不断。公司正在实施的二期浆水饮料生产项目已投入 300 多万元,因厂房为县工业集中区租赁无法抵押,设备等 2400 多万元的资产难以融资,受资金影响项目被迫搁浅。

二是精深加工不足。参与带贫的大部分龙头企业、合作社处于技术链、价值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不高、终端产品较少、生产配套能力不强。以定西为例,2019 年农产品加工业产能利用率(设备利用率)仅为 32.22%,中药材、马铃薯、草牧、粮油加工业分别只有 29.1%、12.22%、43.2%、20.29%,生产设备闲置严重。

果蔬采摘后进行清洗、分级、包装、贮运的只占总产量的 1%,贮运的果蔬不到总产量的 20%,加工的果蔬不到总产量的 10%,导致果蔬集中上市时市场价格下降、收益减少。

三是研发能力不足。甘肃蓝天马铃薯公司尽管公司在马铃薯淀粉行业做到了产能全国第一,但是受研发能力和生产技术限制,从淀粉中提炼加工蛋白比较困难,生产的蛋白在品质和色泽等方面都有差距,因而每吨 1.4 万元的售价较国际价格低 1 万多元,想继续延伸加工高附加值的膳食纤维根本没有能力。陇南大黄是重要道地药材,是“连花清瘟胶囊”的主要原料,礼县陇海药材公司 2019 年销售大黄 200 多吨,出口法国的一级品每斤可达 200 元,但是好的药材没有精深加工为好药品,都以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售出。

四是定点屠宰布局不合理。某黑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说,自己种植苜蓿、林区养殖的黑猪畅销内蒙等地,全县的生猪养殖也逐步发展起来了,但全县没有定点屠宰场,生猪需运输到西峰区屠宰后再外销,不方便而且成本高。

(三)收储环节

一是收购资金紧缺。甘肃盛源菊香农业发展公司是秦安县花椒收购加工销售的龙头企业,去年公司通过金控担保贷款和自筹资金,收购农户花椒 200 多万斤,保证了椒农收益。今年受疫情影响,下游经销商库存积压尾款收不回来,尽管通过降价出售 30 万斤存货和加大线上销售等措施努力创收,但营收资金仅供维持银行贷款利息和工人工资。

二是贮藏能力不足。宁县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矮化自根砧苹果基地,果园面积达到 45 万亩,形成了年 50 万吨苹果的产出能力。全县仅有 5000 吨以上苹果贮藏库 4 处,贮藏能力 6 万吨,算上今年在建的 4 万吨,只有 10 万吨,贮藏基础仍然薄弱,90% 的苹果只得鲜果销售,受制市场变化因素多,缺乏议价能力,价格不稳。

三是冷链储藏和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滞后。

天水市因为缺少低温保鲜库和冷藏库等冷链设施,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存在“断链”现象,农产品公路冷藏运输量仅占运输总量的10%~20%,70%左右生鲜农产品在常温下流通,极易造成二次污染和产品损耗,腐损率达20%~30%,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和价格。集基地种植、收贮、电商为一体,年贮藏销售苹果4.8万吨的庆阳庆新果业公司负责人反映,政府补贴配套的冷藏车容量太小,企业需要25吨以上的冷藏车以保证长距离的冷链运输。

四是一些保鲜库作用发挥不够。为解决贫困村农产品销售难题,省里加大补贴力度在贫困村建设保鲜库,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一些贫困村由于产业规模小等原因没有可供存贮的农产品,保鲜库要么被闲置,要么运行困难(存储量太少,收益不足以保证电费),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四) 流通环节

一是乡村物流体系不完善。快递物流公司主要分布在城区,农村覆盖范围有限。静宁县陇原红果品公司、优选农产品销售公司负责人均表示,各快递公司相互竞争激烈,但都不愿去补农村物流体系的短板,导致苹果从农户地头到分拨中心的周转比较困难。庆阳陇象电子商务公司通过承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开发“云途”快递,在为全县11个乡镇79个行政村提供物流配送的同时,将农产品带出村周转给其他快递公司。公司负责人说,尽管公司解决了农产品出村“最初一公里”难题,但是从农村到县城的运输成本较高,公司处于亏损经营状态,长期下去恐难维持。贫困地区一些特色农产品质量虽好,但受自然条件制约,分布分散、规模小,无法满足客商批量订单要求,合作社面临着“既想找销路、又怕大订单”的尴尬局面。

二是产品上市“最后一公里”存在瓶颈。农产品从市郊批发市场配送到社区和居民小区,价格往往会上涨不少。甘肃腾云时代供应链管

理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在打造生鲜产品城市配送过程中,需要改造提升25个、新建15个蔬菜直销店,既要与社区和小区物业公司沟通,还缺大量资金(每个直销店改造约3~5万元,新建约10万元),而此类民生项目缺乏财政资金补贴支持。

三是步子迈得大,资金跟不上。天水花牛集团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19年销售花牛苹果4000万斤。为保证苹果外销,公司在北上广渝布局营销网络投入了大量资金,步子迈得有点大,流动资金跟不上。康县鸿泰农业开发公司通过托管养殖、电商销售土蜂蜜等农特产品,去年9—12月营收463万元,由于看好市场前景,公司把新筹集的资金用于开发“蜂文化产业园”,建设资金和周转资金都极度紧缺。

四是物流成本偏高。成立于2019年9月的礼县礼一鲜电子商务公司到去年底完成了1000万斤的苹果销售,公司销售人员表示,最大出货量每天可达3万箱,10公斤以内的快递费用,当地快递公司每件6.5元,远高于兰州市场5元和陕西武功县4.3元的费用。庆阳市申通快递公司负责人反映,由于快递园区集散分拨布局不合理、农村物流体系不完善等,导致快递物流费用居高不下。

(五) 销售环节

一是市场体系不健全。一方面,农产品专业市场比较缺乏,乡镇农贸市场亟待升级改造。定西市只有2个大型活畜禽及产品交易市场,畜产品加工和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庆阳市农业农村局有关人员介绍,全市市场建设没有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除27个县乡农贸市场通过省财政以奖代补资金改造提升外,其余大部分农贸市场设施简陋、规模偏小,交易手段落后,一部分乡镇仍没有农贸市场,苹果等专业市场更是缺乏。宁县和盛镇镇长说,全镇年产优质苹果超过10万吨,但是没有一个可供交易的专业市场,都是果农们坐等客商上门的“守株待兔”

式”销售。另一方面,销售经纪人比较缺乏。开展购销业务的龙头企业和合作社规模较小,购销经纪人队伍建设比较滞后,加之市场信息掌握不及时,大部分农户和合作社在销售上没有抱成一团,失去了“议价权”。种植了30年苹果的和盛镇屯庄村果农说,苹果基本上都在地头卖给了“代办”,“代办”各有各的范围,价格人家说了算,有时候一天一个价,只要“代办”给个价就卖了。“代办”们“压价”、“吃秤”,一头压低农民售价,另一头抬高客商收购价,农民不掌握实际行情只得吃亏。

二是营销推广资金缺乏。以陇南市为例,大多小优特产品“藏在深山人不识”,当地企业和合作社推动产品出村上市面临多重困难。首先是农特产品量小且分散,难以形成销售规模。其次是进入超市销售费用高,康县鸿泰农业公司为扩大销售,同华润万家等大型超市作了对接,但是每个店仅入场费就得20多万元,加上周转资金,布设三十家店就得上千万元,合作社无力承担只得作罢。再次是营销跟不上,甘肃桃源饮品股份公司尽管原料、工艺、品质都属国内一流,由于销售打不开,公司产能利用率只有10%,如果正常达产,陇南的核桃将就地消化,公司计划聘请营销团队开展宣传推广,但受资金限制一再迟延。

三是营销专门人才紧缺。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虽具雏形,但大部分服务能力弱,主要依靠政府扶持和项目资金进行运转。各地普遍缺乏高层次专业化营销团队与营销人才,陇南市在全省电商起步早发展好,但是同物联网、直播带货等新模式相比已显滞后,传统电商急需转型升级。平凉、庆阳等地电子商务发展相对缓慢,大家普遍反映乡镇和村级电商专业人才缺乏,交易量非常有限。

四是品牌知名度不高竞争力不强。庆阳苹果种植面积超百万亩,年产量达90万吨,2019年作为“十大绿色甘味”入选农业农村部首次认定的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尽管如此,作为区域

公用品牌的“庆阳苹果”知名度不高。合水县何家畔镇每年苹果采摘时,果农使用印有“静宁苹果”“洛川苹果”字样的纸箱包装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个原因是当地印刷包装企业缺乏、需要到外地购买或定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庆阳苹果”知晓率低,农户们想借“静宁苹果”、“洛川苹果”的“光”卖个好价钱。但这样一来,既不利于自己品牌的提升,又造成了市场混乱、误导消费者。陇南市农特产品种类多、品质好、市场认可度较高,但也普遍存在品牌效应弱、产品附加值低及“三少三多”的问题,即线上产品少、线下产品多,高尖端产品少、中低端产品多,品牌产品少、杂牌产品多,同时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认证的比较少,“入超率”低。

五是供销社主力军作用发挥不充分。在供销社综合改革中,各地都在恢复和重建供销社体系,供销网络基本覆盖了县乡两级,大部分村级服务点还在建设中,供销系统与现代物流、电商、快递之间的融合度不够,服务农产品销售作用有限。天水供销系统企业普遍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服务功能单一,与农民利益联结不够紧密,大部分基层经营网点设施陈旧,使用效益低下,难以大范围开展产销对接,不少网点没有开展线上营销的能力。

六是疫情造成外贸损失。甘肃良源电子商务公司是礼县重要的农产品外贸企业,今年2月公司往尼泊尔出口10个集装箱苹果,因疫情影响,货物在港口等待7天后,尼方仍没有解除交通管制,港口封闭、货物堆积在口岸无法到达市场进行交割,最后只得运回,返回的路上又耽误10天时间,最后苹果全部腐烂。由于没有完成交易,进出口信用保证保险不能理赔,因“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给公司造成了300万元的损失。

(六)保障环节

一是产业链条短、上下游配套缺乏。定西市全力打造“西部草都”,去年饲草鲜草产量1048万吨,然而饲草就地转化率不高,养殖规模

偏小,畜产品加工率只有 21.6%,饲草优势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养殖优势和产品优势,产业链延链补链还有很大空间。定西甘雨沃农产品仓储公司每天要向城区配送 40 多个品种的蔬菜,加之蔬菜收购会产生大量尾菜,之前尾菜都是“堆肥还田”,但由于地处城市供水水源地保护区,环保约束严格,尾菜无害化处理成为产业壮大和公司发展面临的一大制约。作为全省 18 个苹果生产重点县之一的宁县,与苹果产业相关的包装、纸箱、果袋、高强度水泥柱等配套产业仍是空白。

二是政府服务有待提高。宁县尽管正在创建全省唯一的苹果产业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但苹果产业发展用地需求同基本农田保护、粮食生产存在一定矛盾,农业结构调整中土地使用有困难。涉及苹果产业的西部苹果国际商贸城、气调库、乡镇果品交易市场等项目,获取土地使用权的审批环节多、程序多、时间长,成了项目建设的瓶颈。康县惠农核桃专业合作社生产的“陇康老树”系列核桃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生产厂房太小,想要扩建但不知手续如何办、不知道找哪个部门。

三是保险服务有待提升。贫困户种植的高原夏菜、苹果、桃子和养殖的牛、羊等在财政补贴下实现了应保尽保,贫困户的保费由财政全额补贴,或在财政补贴之外承担极少部分。而贫困户种养在全产业份额里只占到少部分,大量种养是由新型经营主体和普通农户进行的,他们的种养由于缺乏财政补贴或参保意识不强,承保数量有限,加之农产品价格采集不准确,产业整体经营风险依然较大。2019 年,省上下达农业保险计划与定西市实际种植面积相比,中央补贴品种覆盖面 50% 以上,省级补贴品种覆盖面不足 8%。除定西市开展的中药材产值保险、极少量苹果“保险+期货”外,农业保险都是保自然风险,价格保险仍处于探索之中,市场风险难以有效防范。人保财险定西分公司、平安财险静宁支公司均表示,基层保险公司人

手紧张、乡镇协保员落实不到位、村农金室运行空转等,导致保险工作力量跟不上。有的县区迟迟没有选择承保机构,4 月中旬才下发农业保险文件,无法落实省上提出的按农时承保的工作要求。今年 5 月初的两场冰雹,让漳县江鱼蔬菜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刚栽植的几百亩菜苗受灾,尽管合作社坚持为基地蔬菜缴纳农业保险,但是保险公司的承保工作相对滞后,往往快到蔬菜采收季节才能完成。遇上像今年一样的极端天气,菜刚种下、保险还没保上,合作社就得白受损失。

四是技术服务有待跟进。农业种养殖需要产前的良种良苗、产中良技良法、产后检验检测和销售信息等服务,然而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静宁苹果”由于发展起步早,大量果树老化,品质出现退化,产量下降,亟待政府加大补贴力度,加快老旧果园改造,在引进培育新品种过程中加强对农户的指导。岷县农产品质检中心工作人员反映,省上扶持各县建立了农产品检测机构、购置了先进设备,但由于地方配套资金有限,基本的检验试剂等材料由于价格较高难以保障,加之检验专业人才缺乏,基层检测机构作用发挥有限,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只得通过省级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增加了成本。

三、政策建议

(一) 加强整体规划和布局

1. 围绕我省“六大特色产业”组建六大企业集团,主要职能是综合协调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流通和出口,组织“六大特色产业”的科研推广、信息服务、教育培训和宣传促销,负责统一证明商标的申报、审验、管理等工作。

2. 在“十四五”规划编制中,围绕全省“六大特色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对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等各种专项规划进行衔接,对部分规划进行调整,处理好富民产业用地同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把“菜篮子”、“米袋子”和农民的“钱袋子”有机结合起来,持

续推进贫困地区产销体系建设。

(二)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1. 统筹涉农资金,首先建设“产业路”,打通村组道路和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其次是逐步配套完善延伸到农田的“产业电”,解决农产品在田间地头的初步加工问题;再次是分阶段实施“产业水”上山工程,建设山坡地小型水利灌溉设施,破解干旱、半干旱山区的农业生产用水难题。

2. 加快建设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在农产品主要产区、优势产区或重要流通区域,以政府投资为引导,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建设集贮藏、加工、分拣、包装、电商、物流、价格发布、质量检测等一体化的交易中心,为农产品转化成商品搭建便捷高效的平台。在其他地区,根据产业特点补贴建设小规模、专业化、季节性临时市场,逐步建成功能互补、大小结合的市场体系。

3. 加快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贫困地区,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建设分拣包装、冷链保鲜等设施,按照“田头市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的模式,重点建设节能型通风贮藏库、节能型机械冷库、节能型气调贮藏库,从源头上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问题。

(三) 积极探索解决融资难题

1. 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根据涉农企业生产经营周期长、效益低、风险大的特点,参照国外和其他省市的做法,发放中长期贷款,一次使用、分期偿还。比如对养殖企业提供3至5年期限的贷款,对果品种植企业提供5至10年期限的贷款。鼓励开展仓单质押、评级授信等信贷模式,实行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还。探索知识产权质押+保险公司担保的新产品和服务模式,解决农业科技轻资产、无抵押的“痛点”。推动“保贷联动”,开展保险融资,对短期出现经营困难的企业,推广“无还本续贷”

和展期措施。

2. 鼓励国有企业围绕贫困地区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以控股、参股、收购等方式对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进行重组改制,带动民营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打造农业产业链大型龙头企业。

3. 在全省其他地区试点并推广“蓝天模式”,总结并不断完善“政府+核心企业(联合社)+银行+合作社+农户+保险”的全产业链融资模式,运用政府的组织优势,鼓励引导龙头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缓解供应链内部缺少抵押物、自身实力较弱的主体贷款难题。

(四) 继续完善农产品保险体系

1. 积极申请增加中央补贴,加大省级配套资金,减少县级配套资金,通过发展再保险、共保险等多种措施,缓解县级财政配套的困难。

2. 制定优惠政策,以财政补贴资金为引导,吸引社会保险资金重点投向“六大特色产业”,实现保险对“六大特色产业”的全覆盖。

3. 鼓励支持开展灾害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贷款保证保险试点,扩大实施“保险+期货”试点范围,同时建立省市县三级农产品价格采集发布平台,提高价格发布准确性,为保费核定和理赔提供依据,提高对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

4. 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调节基金制度,增强保险机构应对农业风险能力。

(五) 鼓励扶持电商物流发展壮大

1. 进一步提升与国内著名电商企业的合作层级,建设省级电商数据中心,为全省电商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信息服务。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商体系,依托现有资源,以县域为单位建立区域电商数据中心,把分散的产品、仓储、物流信息数据化,并同市场需求对接起来,实现乡镇小集散、县区大集散,做到线上购买与线下流通的无缝衔接。

2. 财政列出专项资金,对乡村电商服务人员和合作社电商专职人员进行(下接42页)

“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入境旅游 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史晓寰 伏广彬 任奕

一、引言

甘肃拥有独特的地质地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结出最绚丽的经济文化果实的地方,拥有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旅游资源。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旅游业发展势态良好,国内游客人数连续几年稳步增加,给甘肃省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贡献。同时,入境旅游近几年也有一定的发展,2018年甘肃省入境旅游人数突破1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2740万美元,与2017年相比,分别增长27%和31.4%。但总体上甘肃省入境旅游人数基数小,且发展不稳定,与甘肃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和重要地理地位不成正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加强对甘肃省入境旅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学者对入境旅游作出了大量研究,但研究甘肃省入境旅游篇幅有限,特别是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针对入境旅游的客源市场研究,国外学者 Myriam Jansen - Verbeke(1995)通过建立旅游者集中指数、出游指数、比率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指标体系来研究地区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地的地理特征。Wolfe R. I(2008)在对旅游客源市场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的时候提出了旅游引力预测模型。国内学者南宇等(2011)运用旅游客源市场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空间、消费结构等方

面,对西北五省区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开发进行了探讨。董文珍等(2013)运用地理集中指数、亲景度、竞争态等指标对甘肃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进行分析,探索了甘肃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分布规律及整体特征,指出甘肃省入境市场地理集中指数较小,客源市场比较分散,主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亲景度差异显著,年度变化较大且竞争态呈现上下波动态势。高雪琴等(2019)通过对甘肃省入境旅游流流量与流质演化的特征研究,认为甘肃省整体上旅游流质量欠佳,流质指数趋于下降。

针对入境旅游受地域差异影响的研究,国外学者 Ksenija(2012)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偏远地区的旅游资源利用率是远远不够的,偏远地区的旅游竞争力远远弱于内部地区,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偏远地区提升旅游竞争力的相关建议。Jorge 等(2015)采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分析了地区旅游业的影响因素,并且论证了旅游业在减小地区经济差距、促进区域融合中的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内学者郭晓东等(2015)分析了2003—2012年间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提出2003—2012年,甘肃入境旅游由以往以“酒(泉)、甘(南)”为核心的空间格局,逐渐演变为以“酒(泉)、兰(州)”为核心的空间新格局。冯雯等(2020)研究认为甘肃、宁夏等受限于地理位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普通境外游客的观光体验,影响境外旅游竞争力的提高。

本文主要在以下几点补充和丰富了前人的研究:(1)采用的数据是2011—2018年间,期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新的数据更能说明目前甘肃省入境旅游的发展状况;(2)研究范围更加广泛,从时间、空间、地域差异、入境旅游流构成、入境消费结构等多个层面研究,更具有科学性;(3)通过表格、图形来说明研究内容,研究过程更加直观、易懂。

三、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现状

(一)甘肃省入境旅游总体发展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旅游业快速发展,自2011年以来,甘肃省国内旅游游客逐年增加,2011年国内旅游人数是5826.48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32.57亿元,2018年国内旅游人数已超过3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058.25亿元,短短7年时间,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收入均增长了近6倍。而入境旅游发展却比较缓慢,2011—2013年入境旅游人数均在9~10万人次之间,2014年出现大幅度下降,之后几年又呈现平稳增加趋势,总体来说,较前几年还是有所下降。入境旅游给甘肃省带来的经济

效益与国内旅游贡献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2014年之后入境旅游收入基本是国内旅游收入的千分之一。从人均消费上来看,入境游客的人均消费能力明显高于国内游客人均消费,入境游客人均消费基本保持在1200~1800元,国内游客人均消费还不足700元(见表1)。从旅游人数增长率角度分析,国内旅游人数增长率比较稳定,近几年均保持在20%~30%,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低迷等的影响,入境旅游人数增长率极不稳定,特别是2014年较前几年下降幅度达到50%左右,但2014年以后又有平稳回升的趋势(见图1),恰好在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给甘肃省国际旅游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甘肃省入境旅游人数中港澳台同胞占比较大,基本保持在40%~50%之间,是甘肃省入境旅游的主要群体(见图2),可以成为甘肃省境外旅游开发时重点针对的方向。

表1 2011—2018年甘肃省国内外旅游人数统计表

年份	入境旅游人数 (万人次)	旅游收入 (亿元)	人均旅游收入 (元)	国内游客人数 (万人次)	旅游收入 (亿元)	人均旅游收入 (元)
2011	9.11	1.15	1262.35	5826.48	332.57	570.79
2012	10.20	1.41	1382.35	7824.26	469.67	600.27
2013	9.78	1.28	1308.79	10068.40	618.90	614.70
2014	4.88	0.62	1270.49	12660.20	780.20	616.26
2015	5.45	0.88	1614.68	15632.88	974.47	623.35
2016	7.15	1.27	1776.22	19089.40	1219.20	638.68
2017	7.88	1.41	1789.34	23889.40	1578.70	660.84
2018	10.01	1.87	1868.13	30190.90	2058.25	681.75

注:数据根据2012—2019年《甘肃发展年鉴》相关数据整理;下文同。

(二)甘肃省入境旅游各地区发展情况

甘肃地缘辽阔,地区差异大,入境旅游的发展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根据地域差异和入境旅游发展情况,可以把甘肃省旅游区域划分为

四个旅游圈:以敦煌为中心的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嘉峪关为“敦煌文化旅游圈”;以兰州为中心的兰州、定西、白银为“黄河风情线旅游圈”;以甘南为中心的甘南州、临夏州为“民族风情旅

游圈”；以天水为中心的天水、庆阳、平凉、陇南为“华夏祖脉旅游圈”。由图3可以看出，甘肃省入境旅游主要集中在“敦煌文化旅游圈”和“黄河风情线旅游圈”，这两个地区入境旅游对

甘肃省入境旅游的贡献在90%左右，尤其是“民族风情旅游圈”的入境旅游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华夏祖脉旅游圈”对甘肃省入境旅游贡献很小，特别是2018年，仅占1%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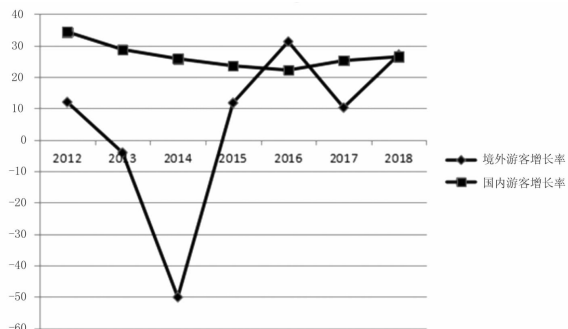


图1 2012—2018年甘肃省国内外游客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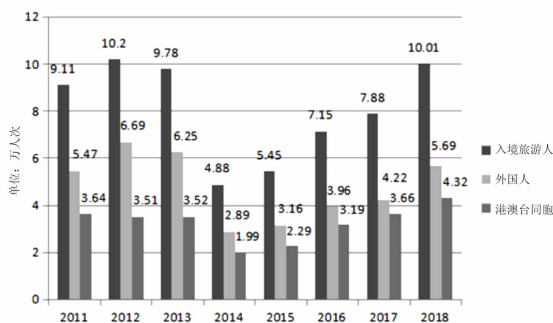


图2 2011—2018年甘肃省入境旅游人数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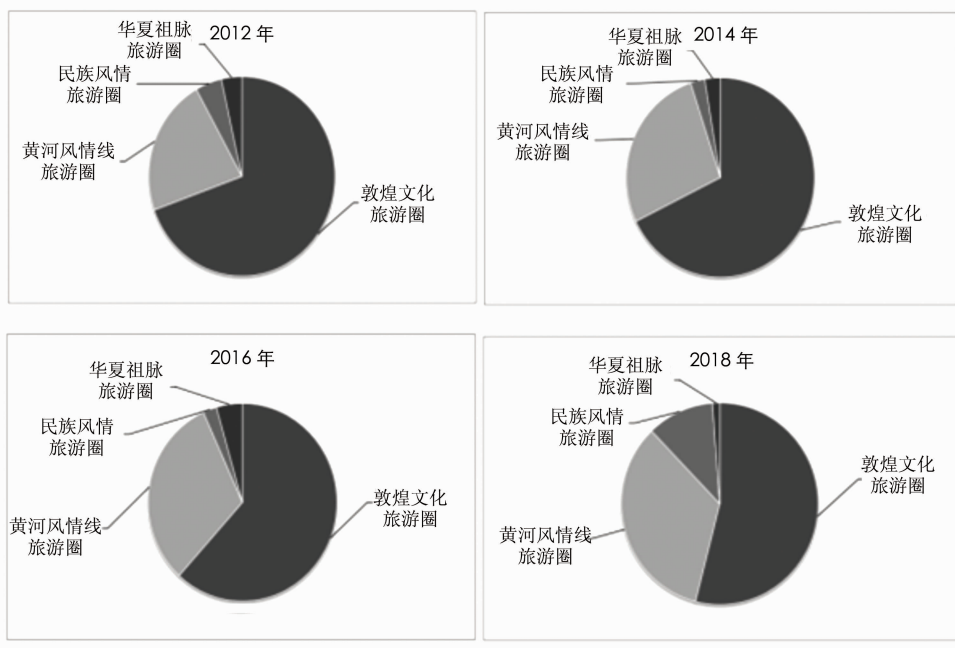


图3 甘肃省分地域入境人数比例

兰州作为省会城市，是甘肃省交通枢纽中心，大多境外游客都会选择兰州作为甘肃旅游的中转站，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兰州集散中心的作用发挥的越发明显，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风情线旅游圈”发展趋势良好，入境旅游人数增长较快，与“敦煌文化旅游圈”的入境旅游人数差距越来越小，改变了以往一家独大的局面。“敦煌文化旅游圈”一直都是甘肃

省入境旅游的主要贡献区域，入境旅游人数远远高于其他旅游圈，是甘肃省入境旅游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增长速度却有所放缓，这说明“敦煌文化旅游圈”旅游资源还没有被充分挖掘，没能充分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甘南州是藏族群众的聚居地，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异彩纷呈，拥有被誉为美丽神奇、纯净

圣洁、世人仰慕的人间仙境——香巴拉、美丽的桑科草原、被誉为“世界藏学府”的拉卜楞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甘南为中心的“民族风情旅游圈”入境旅游发展势头迅猛，2016年入境游客是1677人次，2018年入境游客达到11053人次，是2016年入境游客的6倍多，受到甘南州近邻效应的影响，临夏州入境旅游近年来发展速度也有明显加快。“华夏祖脉旅游圈”作为甘肃省入境旅游的第四大旅游商圈，拥有甘肃省独具特色的重要文化品牌之一的天水市伏羲文化节、道教圣地崆峒山，还有全球华人及港澳台同胞寻根祭祖的公祭伏羲大典，拥有众多的自然文化资源，理应为甘肃入境旅游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入境旅游发展很慢，2011年以来，在甘肃省入境旅游人数比例中一直处在较低水平（见图3）。

总体上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势头有所回升，但是发展仍然缓慢，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发展不稳定，且在不同地域间发展差异较大（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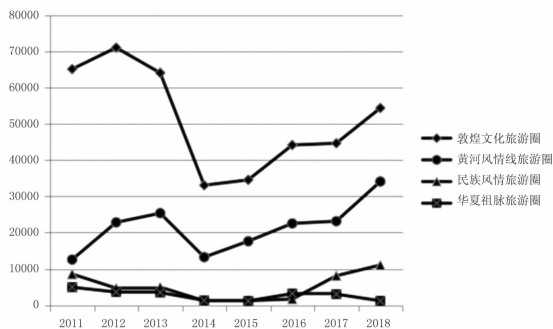


图4 2011—2018年甘肃省四大旅游圈入境旅游人数走向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

（一）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的优势

1. 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独特，备受境外游客认可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

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拥有众多的自然文化资源，有敦煌莫高窟、嘉峪关长城、炳灵寺石窟、玉门关、锁阳城、麦积山石窟和悬泉遗址等7处世界文化遗产，7000多处古文化遗址，337座各类石窟寺，3600余公里遗存长城，近43万件全省馆藏文物，还有入围“中国最美六处奇异地貌”之一的张掖丹霞地貌，拥有会宁县红军长征会师旧址、甘南州迭部腊子口战役遗址、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俄界会议旧址和茨日那毛主席旧居、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等众多红色旅游景区，全省共有A级红色旅游景区8处，形成了1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重要的地理位置更加凸显，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备受国际认可，《孤独星球》公布“2017亚洲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甘肃省荣登榜首，《纽约时报》发布的“2018全球必去的52个目的地”榜单中甘肃省位列第17位，此为中国唯一入选省份。

2. 打造国际旅游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为迎合境外游客旅游需求，甘肃省整合旅游资源，创新发展模式，不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产业，旅游产业得到迅速发展。2017年，甘肃省实施大景区建设、全域旅游示范、旅游业态创新、全产业链打造工作，推出了文化研学之旅、温泉养生之旅、河西走廊摄影之旅等24条冬春旅游线路，打造了欢乐冰雪游、特色民俗游、边塞观演游等10大冬春旅游系列产品，打造“传奇丝路·壮美河西”、“九曲黄河·奇峡秀水”和“华夏祖脉·养生福地”三大旅游目的地品牌，区域旅游整体吸引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2018年，甘肃省构建立体精准营销体系，着力打造“交响丝路·如意甘肃”旅游主题品牌形象，不断打造旅游业发展核心竞争力。2019年，甘肃省将着力实施“大敦煌文化旅游圈”和“河西走廊国家遗产线路”两个具有区域带动性的重大文旅融合工程。

3. 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平台,助推入境旅游发展

甘肃省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合作平台,国际地位与日俱增。甘肃省旅游产业可以通过众多的对外交流平台推向全世界,比如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经过多年持续性打造,已经成为甘肃省对外交流的重要开放平台,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稳步提升,成为甘肃乃至中国旅游的一张国际性名片。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合作的战略平台,是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天水伏羲文化旅游节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十大节庆”活动之一,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和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是全球华人及港澳台同胞寻根问祖的圣地。

(二) 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的劣势

1. 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不够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但是也带来了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的风险。国际形势依然还很严峻,而甘肃省入境旅游对国际环境的依存度很高,在抵御国际环境影响的能力上还明显存在不足,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入境旅游发展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 地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甘肃省入境旅游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仍然一枝独秀,占甘肃省入境旅游的绝大部分份额,但是没有很好的发挥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对周边地区旅游的发展带动较差;以兰州和甘南为中心的中部地区近年来有所起色,但是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优势;以天水为中心的陇东南地区入境旅游发展微乎其微,对该地区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不足,没有形成区域特征。这种地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将直接影响甘肃省入境旅游的整体发展与布局。

3. 国际旅游专线发展缓慢

由图5分析可见,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中民航占比较大,在长途交通外汇收入中占比达60%以上,而铁路和汽车占比不足40%,境外游客一般都会选择航空来甘肃旅游,又由于甘肃缺少大型国际机场,国际飞行线路较少,且费用一般较高,直接影响了甘肃入境旅游的发展,表明了游客在公路铁路路上选择较少,交通不够便利,相应的外汇收入也较少。另外,甘肃省的旅游资源分布比较分散,连接各大景区的铁路不发达,站点有限,有些景点间还没有铁路相通,且公路路况较差,难以大规模的发送旅客,很多境外游客只能选择旅行团或是自驾游,这给境外游客的选择较少,不方便出行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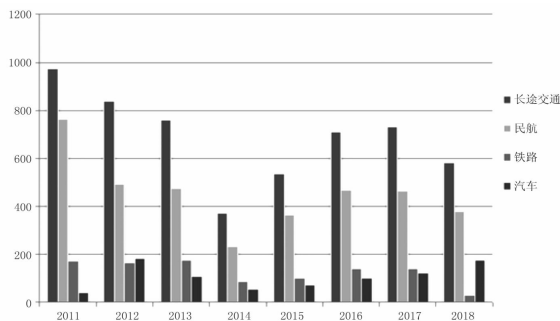


图5 2011—2018年甘肃省入境旅游外汇中交通服务选择构成

4. 旅游业态发展仍然不足

由表2分析可见,2011—2018年甘肃省境外游客的消费大多都花费在交通、住宿、餐饮等几方面,属于基本旅游消费支出,而其占比却在消费总支出的50%以上,而花费在非基本旅游项目如游览、娱乐、商品销售等上面的消费支出却很少,占比不足30%。入境游客在交通方面平均消费支出较大,在游览娱乐方面的人均支出偏少,从商品销售支出可以看出,入境游客有一定的购买愿望,但是并不强烈,从住宿餐饮平均消费支出方面可以看出,入境游客对星级宾馆的消费喜好较低,在甘肃停留时间较短。

以上数据分析说明甘肃省旅游产业结构单一,旅游资源开发不足,文化旅游资源缺乏深层

次的整合开发,大多数的景区还处于传统的自然发展状态,旅游产品仍旧是单一游览观光的

初级开发状态,没有形成规模化、有特色的旅游

表 2 2011—2018 年甘肃省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及构成

(单位:万美元)

年份	总收入	交通费用	游览	住宿	餐饮	商品销售	娱乐	邮电通讯	其他
2011	1739.77	1010.80	90.47	207.03	92.21	172.24	92.21	19.14	55.67
2012	2235.00	923.06	192.21	353.13	127.40	426.89	38.00	42.47	131.87
2013	2039.00	823.76	169.24	277.30	150.89	328.28	61.17	46.90	181.47
2014	1017.14	381.42	107.82	144.43	88.49	171.90	17.29	23.39	82.39
2015	1418.10	577.74	123.52	211.72	114.58	225.05	65.23	23.54	76.72
2016	1913.91	767.48	164.60	285.17	162.68	298.57	89.95	38.28	107.18
2017	2086.00	792.68	162.71	337.93	173.17	354.62	98.04	37.55	129.33
2018	2829.74	648.01	271.66	698.95	325.42	540.48	59.42	14.15	271.66

文化产业,也没有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旅游产品,只是依靠初始状态的旅游地历史文化内涵来吸引境外游客,缺乏对国际化市场的旅游发展战略,导致甘肃旅游存在可容纳游客较少、游客游玩时间相应较短、平均花费较少的问题,阻碍了甘肃旅游品牌的打造,也限制了游客大规模地进入,不利于甘肃入境旅游产业的发展。

5. 旅游管理和国际性宣传推介不足

甘肃省旅游资源实行多头管理,有 35 处省级以上景区资源隶属省直部门,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 7 个文物类景区由省文物部门管理,兴隆山等 23 个自然类资源由林业部门管理,有 5 个景区分属水利、农垦部门管理,麦积山景区由文物和林业两个省级部门管理,各个景区之间不能统筹规划资源,难以整合利用。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偏低,地区间差异较大,旅游市场营销时并没有把网络充分利用到宣传拓展旅游市场之中,没能形成知名国际化的旅游品牌。甘肃旅游整体的信息平台建设不够完善,全省电子地图、卫星导航设备程度低,旅游资源共享、旅游市场信息发布、旅游交通状况和网上售票、住宿预约等旅游信息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游客的需求。旅游企业运营仍旧是主要为传统

方式,缺少现代化的技术,在对外推广和市场营销上比较滞后、力度不够,在国际上的旅游推介不足,虽然几年来逐渐重视海外的宣传,但是宣传力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没有充分利用敦煌这一世界性的名片提高甘肃省整体的对外知名度。

(三) 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机遇

1. 历史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甘肃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地段,其重要作用在国际上不断提高,旅游资源备受国际媒体关注,2017 年,甘肃省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明显提高,被国际权威旅游指南《孤独星球》评选为亚洲十大最佳旅游地第一名,在 2018 年全球著名媒体《纽约时报》发布的“2018 全球必去的 52 个目的地”榜单中甘肃位列第 17 位,为中国唯一入选的省份。“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甘肃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为甘肃旅游强省建设带来重大历史机遇。

2. 市场机遇

2016 年起,甘肃文旅开始实行海外推广战略,以 Facebook 主流媒体为首,建立起英文、日语、韩语、俄语、阿拉伯语和繁体中文六种语言页面,打开国际旅游市场,为甘肃海外推广奠定

了基础。甘肃旅游局先后参加国家旅游局组织的2016 印度“中国旅游年”开幕式、“美丽中国—2016 内地旅游(港澳)嘉年华”、赴澳新“美丽中国—天下黄河”、赴印尼、马、新“美丽中国—古老长城”、第11 届海峡两岸台北旅展等系列旅游推广活动,牵头组织丝绸之路旅游推广联盟成员单位赴德、法、英开展“丝绸之路推广活动”,自组团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俄罗斯、捷克、匈牙利举办甘肃旅游宣传推广活动。2019 年春节期间,甘肃以民俗文化和智慧旅游等为特色主题,积极布局国际前沿媒体,进行线上广告投放和集中曝光,通过路透社、BBC、Time 和 CNN 等媒体重点投放到欧美、港澳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市场,并将与路透社合作试水,在其官网搭建甘肃 Mini-site 英文网页,向全球关注者介绍甘肃形象、旅游路线、美食和国际旅游节四个板块的内容。

3. 政策机遇

2010 年5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甘肃省的全方位发展给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其中就有要加大对甘肃省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补助。甘肃省政府一直将旅游业的发展放在核心地位,2013 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制定了《甘肃省贯彻落实中央“一带一路”大战略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的战略定位。2017 年,甘肃省共建设旅游项目1162 个,总投资 3947.02 亿元,并积极争取到国家旅游局旅游发展基金补助,省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向市州安排 3880 万元旅游基础设施项目补助。2018 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意见》,并提出要推动甘肃旅游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不断加快旅游强省建设。

(四) 甘肃省入境旅游面临的挑战

1. 入境旅游客源被周边省份分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甘肃省入境旅游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入境旅游客源仍然很

少,甘肃省旅游资源与西部其他省份旅游资源相似,特别是与陕西和宁夏两省旅游资源同质化严重、相似性过高、区分度较低,导致入境旅游游客在一定程度上被周边省区分流,另外相较于陕西,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薄弱,地理位置偏远,也是客源被分流的原因。

2. 生态环境面临失衡危险

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三大交汇地带,自然环境基础差,环境保护和治理投入不足,由于过度开发,导致近年来大气和水体污染、植被破坏、耕地缩减,直接导致沙尘暴、泥石流、山体滑坡、草原退化、失常气候增多等生态气象灾害频发,比如祁连山局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舟曲特大泥石流等。另外,随着甘肃省旅游的发展,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新的压力,在一些景区内垃圾成堆、人为破坏严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入境游客的观光体验。

五、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甘肃省作为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省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富集度位居全国第五,将再次担起经济、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外交发展旗帜,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文化载体,应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创新发展模式,拓宽境外旅游市场,促进入境旅游的快速发展。

(一) 打造国际旅游圈,形成具有甘肃特色的国际旅游品牌

甘肃省要抢抓“一带一路”倡议重大机遇,整合省内优势旅游资源,盘活旅游产业,打造特色国际旅游线路和品牌,形成“西北地区飞跃发展、中部地区协调发展、东南地区跟进发展”的全新局面,“以点带线连面”协调发展,以促进全省入境旅游的快速协调发展。以敦煌为中心,加快“大敦煌文化旅游圈”和“河西走廊国家遗产线路”等重大文旅融合工程建设。建设以兰州为核心的“黄河风情线旅游圈”,纳入兰州新区、白银、定西等地的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圈旅游业态,做强做大境外旅游品牌,增强竞争

力与吸引力。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特点,充分发挥自然景观优势,以甘南州为中心,携手临夏州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风情旅游圈”。发挥陇东南旅游联盟作用,整合区域内文化旅游资源,以寻根祭祖为主线,共同打造“华夏祖脉旅游圈”,以弥补陇东南地区的入境旅游短板。

(二)通过吸引在国内的留学生,开发甘肃境外旅游客源

2018年在中国留学的留学生达到50万人左右,预计今后将以10%的速度增加,这是一个很大的来甘肃旅游的境外市场,甘肃省应充分利用这一群体的蝴蝶效应,出台政策支持,提高服务能力,对在华留学生开展相应的旅游促销活动,吸引留学生来甘肃旅游,让他们亲身感受甘肃的自然文化资源,运用他们对甘肃的口碑向其国内其他人作“义务宣传员”,引发良好的市场效应,扩大甘肃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竞争力与知名度。

(三)提升交通运输能力,打造境外旅游专线

发展旅游业要与推动交通运输融合发展,受甘肃省东西地域狭长的制约,应大力发展空运能力,合理规划建设兰州国际航空港,充分发挥西北旅客集散中心的作用,积极开辟兰州至日韩、港澳台,中亚等国际和地区航线,切实为境外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还应大力发展高铁建设,改善高速公路路况,在各高铁站、火车站、景点间开通旅游专线、旅游直通车等客运业务,全力构建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全方位立体交通网络,改善各景点间交通状况,使境外游客在甘肃省内旅游更加便捷,各景区之间往来更方便,节约旅游时间成本,提高交通的快捷性。

(四)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推动旅游设施标准国际化

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缺少大型重工企业支撑经济,文化旅游业已发展成为甘肃省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发展旅游业对于甘肃省来说,既留住了青山绿水,又能助推精准扶贫力度,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甘肃省旅游设施相对落后,制约了入境旅游的发展,应积极引进外商投资旅游产业,在投资主体、旅游产品、旅游服务、旅游接待设施、客源结构等方面加大国际化步伐,积极构建国际化的旅游标识、道路标识、旅游咨询服务、旅游紧急救援系统等,不仅能够吸收外资,推动旅游设施标准国际化,还可以学习到国外先进的旅游管理模式和理念。

(五)借助对外推介平台,抢占境外旅游市场份额

甘肃省应该面向不同的境外市场打造几款具有甘肃文化特色的宣传片、微电影等,借助众多省内对外推介平台、国际会议等,依托境外知名旅游企业设立旅游营销推广中心,通过网站、直播平台、影视剧、真人秀和媒体通讯社等传播平台,大力宣传甘肃省文化旅游圈的建设,分享甘肃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地形地貌风景资源,吸引境外游客关注和参与甘肃省文化旅游。甘肃省夏季气候凉爽宜人,是游览避暑的好地方,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条件,建设国际避暑度假旅游区,在境外游客比较关注的旅游信息排名网站上发布甘肃旅游信息,通过在夏季举办各类国际性节会展会时在避暑度假旅游区设立分会场,让境外游客充分感受甘肃夏季的舒适温度,还可以在各大国际机场、高铁站等人口密集的地方打出如“冬去海南旅居、夏来甘肃避暑”的标语,让更多的境外游客了解甘肃、走向甘肃、向往甘肃。

(摘自《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作者简介:史晓寰,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观点摘编

“十四五”甘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策

陶君道在《甘肃金融》2020年第10期撰文指出,解决甘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发展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作为推动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对策:1. 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 紧跟世界制造业发展趋势;3. 以数字化制造为重要抓手;4. 大力发展技术驱动型生产制造企业;5. 大力实施制造业品牌强省战略;6. 大力培育壮大制造业产业集群;7. 着力提高制造业企业“三化”水平;8. 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作用;9. 大力培养制造业优秀“企业家”精神。

关于甘肃“十四五”时期要解决好

“五个三”问题的建议

省政府参事室在《调查与研究》2020年第10期撰文指出,“十四五”时期甘肃应着重解决好“五个三”问题:1. 实现三大目标: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缩小甘肃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缩小甘肃与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甘肃与全国发展环境差距的三大目标。2. 扭转三大趋势: GDP 占全国比重逐年降低趋势、人均 GDP 全国倒数第一趋势和居民收入连年倒数第一趋势。3. 处理好三大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关系。4. 解决三大问题: 转变发展观念、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内、对外开放度。5. 抓好三大领域: 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经济与民生保障。

甘肃需要培育更多爆发式

增长的龙头企业

杨映琳等在《调查与研究》2020年第11期撰文指出,作为西部追赶型发展区域,甘肃当前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主体的支撑力量,千方百计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培育更多爆发式增长的龙头企业。通过“解剖麻雀”的调研分析,兰州新区商投集团属于其中的典型代

表。全省各地可以以此为榜样,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在培育爆发式增长的龙头企业上聚焦发力,以企业的成长壮大撑起甘肃发展的新天地。建议:1. 构建新型专业化市场交易平台;2. 助推口岸平台加快拓展业务;3.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4. 支持商投集团打造上市公司;5. 延续执行中欧中亚班列货运补贴政策。

甘肃省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护机制探讨

张重花在《甘肃农业》2020年第7期撰文指出,甘肃立足省情和水情实际,因地制宜解决农村饮水问题,近40年来,甘肃农村饮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分析总结了目前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护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工程建设不完备、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维修保养制度不够健全、运行管理单位能力不强、工程村级管理依然薄弱。对策建议: 加大工程提质增效、落实维修保养经费、创新运行管理模式、建立健全机制、强化末级管护。

甘肃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运行过程中

遇到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李英英在《甘肃金融》2020年第5期撰文,文章基于甘肃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实施现状,分析指出甘肃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运行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大病保险基金来源渠道窄、参保率过低、大病保险费用不确定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提出了拓宽大病保险基金来源渠道、加强大病保险宣传、提高参保率、形成多元化监督体系等政策建议。

甘肃省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与经济增长的

协整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毛雪艳等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保障,甘肃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通道。基于1978—2018年甘肃省的数据为样本,对甘肃省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经济的增长导致了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扩大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可以在加大甘肃省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同时超前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以促进甘肃省经济的发展。

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

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张春燕在《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撰文,基于对甘肃社情和省情的考量,从《深入实施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5—2020年)》的总体要求、主要行动、基础工程等方面出发,梳理了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成就与困难。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能力和综合效益六个维度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建立了由6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助力提高甘肃省经济竞争力,推进甘肃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环保法下甘肃重化工业发展面临的

主要问题和对策分析

郭晓明在《甘肃科技》2020年第19期撰文指出,在新的《环境保护法》框架下,处理好重化工业发展速度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对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指出,甘肃省重化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1.重化工企业生产运行机制不断优化,但经营压力持续加大;2.重化工产业基础较好,但产业链条短,聚集效应有待提升;3.重化工核心企业竞争能力较强,但产业整体发展后劲不足;4.企业循环经济水平逐年提高,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保护压力;5.煤化工产业有一定的资源基础,但面临诸多制约因素;6.科技创新引领能力逐年增强,但区域协同创新的机制有待完善。政策建议:1.避免重视工业而忽视服务业发展,切实把拓宽产业链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2.着力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切实发挥企业作

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3.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切实把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优化所有制结构作为重大战略举措;4.发挥产业集群优势,鼓励龙头企业从自身调整,向企业重组、产业链整合和产业升级迈进;5.重视对产业布局的规划引导,避免各地都以重化工业为发展重点而形成新的重复建设;6.发挥重化工核心企业作用,做好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这篇大文章。

文旅强省战略下甘肃省文化产业与

旅游业融合水平测评研究

陈兵建等在《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5期撰文,文章选取甘肃省2012—2018年时间序列数据,基于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测评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程度。研究发现:甘肃省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逐年攀升,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快于旅游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两产业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稳步向好,由2012年严重失调状态最终平稳过渡到2018年优质协调阶段。为更好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途径,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可持续

生计风险分析及对策

刘燕华在《甘肃科技》2020年第17期撰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A县为例,指出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生计存在的风险因素:1.内部连接密度大于外部沟通导致宏观社会资本存量不足;2.自信心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导致心理资本缺失;3.产业扶贫项目及金融支持扩大和提升不足;4.因教育和人员外出导致人力资本存量不足;5.旅游文化资本富集的优势无法凸显。对策思考:1.实现农户的主体治理和唤醒主人翁意识;2.扶贫与扶志并驾齐驱,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3.尝试建立社会组织信用担保,争取金融资本扶持力度;4.通过教育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5.以文化旅游资本带动从乡村经济腾飞。

(张芳胜/摘编 沈凯心/校)

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金融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张 辉

乡村旅游不仅是推动农村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更是提高贫困农村地区农民收入,助力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乡村旅游作为接通城市和乡村的重要桥梁,对促进城乡资本、劳动力等社会资源流动和再分配,缩小城乡二元差异,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是乡村振兴战略极为关键的支持要素,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垫脚石”,乡村旅游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

甘肃省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一)政策支持力度大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乡村旅游发展,2015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201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重点扶持6000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从2020年开始,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每年让2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扶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甘肃省及时抓住发展机遇提出旅游强省战略,制定了一系列旅游扶贫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研究制定了《2018—2020年脱贫攻坚财政资金安排计划》,提出三年内将提供3亿元乡村旅游专项资金,在全省范围内重点扶持500个村发

展乡村旅游,推动建设10000个标准化农家乐,实现8.5万贫困户、35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真正使乡村旅游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兵利器”。

(二)市场前景广阔

乡村旅游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发展现已具备相当规模,中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发展成长阶段,具有发展快、潜力大、市场广、利润空间大等优势。数据显示,2013—2018年期间全国乡村旅游人数持续增长,2018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30亿,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

(三)乡村旅游资源丰富

甘肃省旅游资源70%集中在乡村地区,目前甘肃省通过创新旅游发展模式,积极促进乡村旅游的多元开发,突出“土气”“老气”“生气”“朝气”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创建了一批特色乡村。截至2018年6月,全省已建成650个乡村旅游村,13937户农家乐,27个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2个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12个“双带双加”旅游扶贫先进典型。2019年7月,甘肃省12个乡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乡村名单”。甘肃省紧跟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发展机遇,积极将陇原田园风光、村落形态、民俗文化、特色物产、舌尖诱惑,借助乡村旅游发展的“快车道”展现给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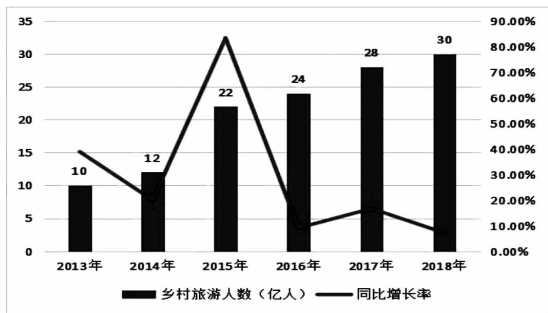


图1 2013—2018年全国乡村旅游游客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四) 旅游产业发展形势良好

甘肃省旅游产业整体发展迅速,2013—2018年,全省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快速增长。2018年甘肃省接待旅游游客3.02亿,综合收入206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6.4%和30.4%,当年文旅产业对全省GDP贡献度超过7%,旅游产业已为甘肃省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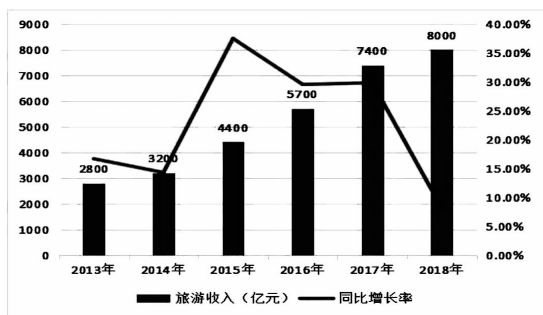


图2 2013—2018年全国乡村旅游收入统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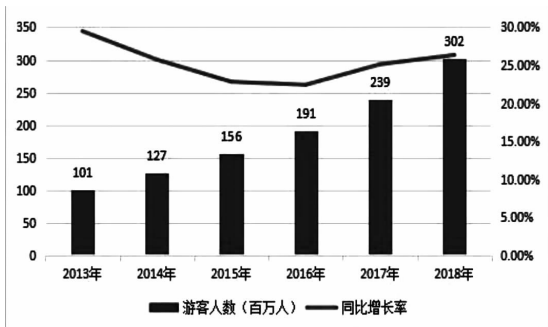


图3 甘肃省2013—2018年接待游客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甘肃省乡村旅游同样发展迅猛,2018年乡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8520万,实现综合收入16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1.1%和29.4%。甘肃省乡村旅游收入连年高速增长并有望在2020年突破200亿元,乡村旅游已经逐渐成为甘肃省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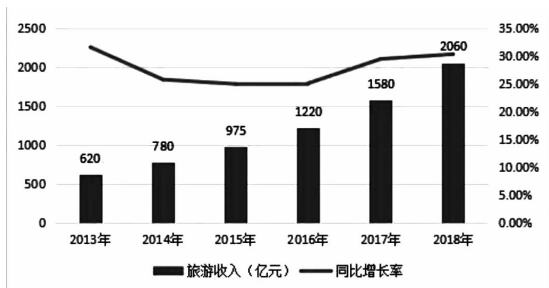


图4 甘肃省2013—2018年旅游收入统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五) 扶贫效果显著

甘肃省重视旅游扶贫方式,坚持以“富裕乡民”为乡村旅游建设标准,2018年全省安排8.2亿元资金用于开展深度贫困县区旅游扶贫项目,主要用于改善贫困地区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数据显示,2018年甘肃省乡村旅游产业扶贫效果良好,发展乡村旅游带动3.1万户建档立卡户,提供就业岗位76万个,使13万贫困人口脱贫,目前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已成为甘肃省扶贫的重要抓手。

甘肃省金融支持乡村旅游面临的问题

虽然国家和甘肃省在金融服务乡村旅游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方针已较为明确,但许多地区在推动金融支持乡村旅游发展方面仍面临不少问题。

(一) 地方政府缺乏有效引导和支持

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引入社会资本认识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缺乏投融资意识,不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旅游产业,同时有的地方政府又急于求成,在引入社会资本过程中只注重资金投入,缺乏有效规划和配套支持,导致投资效果不佳、收益较低,严重影响了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在促进乡村旅游发

展方面虽出台了不少具体措施,但实际操作仍存在不执行、慢执行、执行不到位的状况,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及其他社会资本处于观望阶段,进入乡村旅游市场意愿不强,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业长远发展及其综合效益的提升。

(二) 金融机构支持力度不够

一是大多数乡村地区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这些地区金融机构的网点机具覆盖率低,建设成本高,所以金融机构推进服务网点建设的动力不足。二是乡村地区融资方式单一,以商业贷款为主,且存在获取难度大、门槛高的问题。三是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不够丰富,金融服务针对性不足、效果不佳,虽然各金融机构针对服务“三农”推出了许多信贷产品和服务,但目前尚没有专门针对乡村旅游开发出的金融产品,整体来看对乡村旅游金融支持力度不够。

(三) 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

甘肃省乡村旅游市场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多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以“农家乐”为主要经营模式,市场多以乡村村民和个体户为主,从事乡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企业较少,且多是小微企业,乡村旅游市场主体存在资金实力不足、管理不善、效益不高的缺点,导致对乡村旅游的投入不足、开发不够,难以发展成为品牌化、规模化的产业集群,缺乏核心竞争力,游客吸引力不强。

金融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建议

(一) 地方政府应加强引导,有效促进金融服务乡村旅游

甘肃省地方政府应强化政策落实,加强开发投资引导,建立健全乡村信用评价体系,构建乡村旅游投融资平台,持续优化乡村金融环境,逐步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规范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乡村旅游产业。应加大财政政策 and 货币政策支持力度,大力支持发展乡村旅游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重点扶持乡村旅游市场参与主体做大做强,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在引导支持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充分结合

不同乡村地区实际综合施策,促使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为乡村旅游产业提质升级、可持续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二) 金融机构应提高认识,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一是要提高认识,要意识到服务乡村旅游不仅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更是促进自身转型升级的新动力。二是要加强调查研究,积极了解乡村旅游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主动破解乡村旅游发展融资难题,及时推出符合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加大乡村旅游产业信贷投放力度,适当降低乡村旅游主体的融资门槛,在利率、抵押、期限等方面予以倾斜。三是提高网点机具覆盖率,在重点发展乡村旅游的地区加大资金支持,不断加强乡村金融机具布放力度,提高乡村地区金融服务获取程度。四是创新金融发展,探索以经营权、门票等收益权作为质押的新型贷款方式,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创新方式实现共赢。

(三) 村民、个体户和企业应强化市场意识,提高乡村旅游市场主体的融资能力

农户、个体户、企业等乡村旅游参与主体要立足市场竞争需要,全面理解市场竞争性原则,摒弃发展乡村旅游一贯的“小农思维”,树立品牌经营理念,打造精品形象工程,培育乡村旅游产业化龙头企业和联合体,不断提高投融资能力、盈利能力和金融资源承载力。同时应积极发挥主体优势,创新乡村旅游服务方式,从同质化严重的“农家乐”中走出来,摆脱“农家饭、农家院、农家景”的初级发展模式,探索集休闲、度假、商务、养生等为一体的多元发展模式,通过转型升级打造文化引领、大众休闲的乡村旅游市场主体。

(摘自《甘肃金融》2020年第5期)

张芳胜/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张辉,中国人民银行定西市中心支行。

甘肃省深度融入“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金融思考

赵先立 贾娟琪 赵经涛

为深入把握新发展格局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明确甘肃省畅通“双循环”、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实践路径,以及如何发挥好金融在此进程中的支持作用,本文通过对“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办?”四个问题的回答展开分析,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

充分认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时因势作出决策部署,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和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信号。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把舵定向,指出“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第15次会议上强调:“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新发展格局这一全新命题的提出,蕴含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形势发展变化的科学洞察和全面把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落实、中期谋划、长期布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形成新发展格局,不是被动的权宜之计,而是主动的战略抉择。随着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新发展格局成为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由2007年的9.9%降至当前不足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顺应这一转变,利于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于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形成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坚定不移,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是辩证统一关系。通过匹配内部市场,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世界经济更加紧密联系,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形成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要扭住。中国有14亿人口、9亿劳动力、4亿多

中等收入群体、1亿多市场主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重“三个比重”,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形成新发展格局,科技创新这个新增长极要抓好。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事关中国发展全局,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将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二)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对激发新动能、重塑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到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讨论;从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部署经济工作;从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从外部环境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从内部运行看,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在疫情冲击下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

从短期看,新发展格局有利于缓解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的冲击,有效落实“六稳”“六保”目标。从长期看,新格局有利于激活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内生动力。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和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同时,推动供给需求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均衡,又为国内循环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在供给层面,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需求层面,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人口规模和中等收入群体均居于世界首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均位居世界前列。在制度和机制层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全国大市场也在各类基础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下运转畅通。相对稳定、相对独立、富有效率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在发展和安全层面,要在动荡复杂的世界体系中构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韧性的经济体系,就必须以内为主,既要持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断点和堵点,也要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寻找到持续、安全、高效、稳定的动力源和支撑面。

新发展格局下甘肃省畅通“双循环”的着力点

当前,随着国家对西部发展倾斜支持力度的逐步加大,随着“一带一路”向西开放和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各类要素加速向西部地区转移集聚,甘肃省经济发展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多重叠加的战略机遇期。新发展格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谋划和布局,为甘肃省在“危机中育新机”创造了良好环境,有利于甘肃省用足用好新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一带一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构建兰西城市群、兰白创新试验区等政策机遇,不断

优化区域布局、加快转型升级、培育竞争优势。从国际循环看,新西部大开发战略鼓励面向欧亚大陆桥的开放,甘肃省充分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通道、节点作用,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循环,可作为“回旋余地”减轻我国外贸出口压力。从国内循环看,随着“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的格局展开,甘肃将“内陆变前沿、客厅变门户、低地变高地”。通过兰州新区、兰白创新试验区等平台,与东中部省份互惠合作,在甘肃省打造新的科技园区、产业基地,能够实现经济跨区域循环互促。同时,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可避免我国制造业外迁导致空心化、防止全产业链优势被削弱。因此,推动甘肃省深度融入全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从供给和需求两端齐发力。供给端,主要是牢牢抓住补短板和锻长板这两个关键点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端,主要是加大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动力。

(一) 供给侧:补短板、锻长板

甘肃作为内陆欠发达省份,要充分认清新格局下甘肃省在产业、区位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加快补短板、锻长板,强弱项、扬优势,着力破解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

1. 积极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坚持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相结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甘肃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基础产业基地,石化、有色、冶金、电力等传统重工业占到规模工业的80%以上,对全省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随着全省工业增速持续下滑、工业投资大幅下降,成为了制约全省经济稳增长的主要短板。一方面,要加大对传统工业企业的“三化”(“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将重点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延伸产业链做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提高企业产品技术、质量效

益和环保能效等,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品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另一方面,要结合全省特色产业优势,大力培育发展以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产业、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培育产业集聚发展新优势,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转型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表1 甘肃省畅通“双循环”着力点

供给端	补短板	产能过剩、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加大对石化、有色、冶金等传统产业的“三化”改造
		物流大通道建设滞后、物流成本高、新业态发展落后	强化国内大通道建设、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利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
		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弱	保护与发展并举
	锻长板	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基础产业基地	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发挥独特区位优势,打造文化、枢纽、技术、信息、生态“五个制高点”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十大生态产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需求端	投资	新基建	5G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新型城镇化	农村地区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投资
		重大工程	交通、水利等
	消费	脱贫攻坚	提高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
		乡村振兴	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力,农村新业态吸引城市消费
	出口	贸易产品	促进甘肃省资源深加工产品、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出口
		贸易方式	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服务外包
		服务体系	开放合作平台,扩宽口岸开放和功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2. 抢抓向西开放战略新机遇。甘肃省具有联结西北与西南、中亚与东南亚、“一带”与“一路”的枢纽地位,国家赋予甘肃“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的定位。近年来,甘肃省紧抓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交通优势,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发展的同时仍存在物流大通道建设滞后、物流成本高、新业态发展落后等问题。我们要抢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构建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向并进的开放新格局。一是强化国内大通道建设,不断完善省内中心城市(兰州、天水、酒嘉)间的铁路公路网络布局,强化中心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尽快打通直达青岛、连云港、成都等大物流通道,建成连接西北西南地区的现代物流基地,积极打造西部物流大通道和产业集聚地。二是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加强班列运输对接,增强始发直达和集零成整的中转能力,推动兰州、武威两大国际枢纽陆港,兰州、敦煌两大国际空港协同发展。三是利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创新合作机制,落实深化陆海双向开放,加快建设向西开放的贸易平台、交通平台和战略平台,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建设,打造向西开放新高地。

3. 探索保护与发展并举新路径。甘肃省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弱,生态的脆弱性、战略性、复杂性在全国都属典型,维护生态安全是甘肃的底线性任务。紧紧围绕甘肃省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任务,加快推进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建立生态保护长效机制,积极探索保护与发展并举的新路子。一是把构建绿色生态产业体系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着力发展以文化旅游、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优势产业为重点的十大生态产业,为甘肃绿色发展提质增效。二是加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污染治理力度,以市场补偿和政府补偿相结合的形式,形成黄河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将生态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相结合,将区域旅游、农产品等生态特色产品作为贫困地区保护与发展结合的突破口,重点发展以戈壁农业、循环农业为主的资环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生态产业发展带动脱贫攻坚,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二)需求侧:激发“三驾马车”新动能

当前,甘肃省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动能转化窗口期,同时也是重大任务攻坚期,在动能支撑上,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统筹协调投资、消费、进出口这“三大需求”,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消费的基础作用,使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有效结合,同时以更高的开放水平释放高质量发展内需潜力。

1. 以“两新一重”拉动新投资。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同时,通过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带动并促进民间投资的回升及稳定增长,全面提升全省投资速度和质量。一是加大甘肃省在5G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将以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作为带动投资的新增长点,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打牢基础。二是加大对农村地区住房、医疗、教育等新型城镇化建设领域的投资力度,促进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补齐甘肃省在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短板,促进城乡相互融合发展。三是继续发挥传统的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在拉动投资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在甘肃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仍需要较高的投资率带动,推进重大工程建设,短期对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具有积极作用,长期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原动力。

2. 以乡村振兴带动新消费。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重点是补消费市场的短板,在全面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有效衔接之际,

无疑是拉动乡村消费、扩大农村地区内需的好时机。甘肃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2019年,甘肃省约有93.5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0.9%,在看到脱贫攻坚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反映出甘肃省农村地区的巨大消费潜力。一是通过脱贫攻坚改善收入分配,强化收入再分配,切实提高贫困人口收入,解决低收入人群消费力低下问题,激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二是以“六大特色”产业为支撑,着力以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振兴,结合各地特色,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效益,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力。三是以乡村振兴带动农村地区新业态的发展,通过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吸引城市消费,反过来以消费扶贫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使农村既是扩大消费内需的优质产品和服务输出地,也是消费品潜力巨大的流入地。

3. 以“一带一路”促进新开放。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下,积极发挥甘肃向西开放的固有优势,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往来,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策略,推动内需与外需、出口与进口、“引进来”与“走出去”协调发展,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提高甘肃省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一是不断优化外贸主体结构、商品结构、市场结构,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在开拓市场、做强品牌、做优产品、做强基地上下功夫,促进全省资源深加工产品、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出口。二是借助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武威保税物流中心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创新型贸易模式,探索电子商务与支柱产业、龙头企业相结合的电商模式,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三是加快“大通关”服务体系改革,搭建开放合作平台,扩宽口岸开放和功能

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提升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

金融赋能甘肃省畅通“双循环”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要畅通甘肃省内省外“双循环”,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全省经济的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均面临深刻的调整,对金融系统、金融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适应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变化新特点,就必须发挥金融支持甘肃省畅通“双循环”的稳定器、加速器和连通器作用,提高金融赋能甘肃省畅通“双循环”的广度、深度和强度。

(一)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足流动性

一是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培育和加快行业龙头企业上市步伐,支持和鼓励新型科创型企业在新三板、科创板上市融资,加大企业债、公司债、地方债等直接融资工具的发行力度。二是改善和优化信贷资源结构。合理安排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提高制造业、新基建等领域的中长期贷款比重。改善信贷资源配置、信贷风险评估、信贷政策、激励考核、金融科技手段运用和尽职免责等,构建金融机构对民营和小微企业“愿贷、敢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创新“三农”金融服务产品和方式,提升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快发展线上+线下消费金融,着力提升居民装修、家居、教育、旅游、购车、医美等场景消费。三是切实降低融资成本。督促法人金融机构杜绝高息揽存的恶性竞争行为,引导存款利率下行。用足用好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释放LPR改革潜力降低贷款利率,进一步引导贷款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减少银行收费。

(二) 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供给能力

一是积极引进和培育证券、保险、基金、信

托、资管等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逐步扭转甘肃省银行业独大、金融机构单一化、同质化的市场格局。二是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重点开发和营销立足甘肃省省情实际、适宜全省特色产业发展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产品方案。三是积极探索推动 ABS(资产证券化)、ABN(资产支持票据)、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融资模式,为以新基建为主的未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供强大融资支持。

(三)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打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建立健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机制、正向激励机制、责任约束机制、金融协调机制,打造金融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长效运行机制。二是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司法、电信、税务、金融等多领域信息数据交流共享、共建综合性大数据平台。加大逃废债打击力度,大力化解存量不良贷款,摘掉甘肃金融高风险区的帽子。加强全社会诚信宣传和舆论监督,打造“信用甘肃”。三是建立政府、定价、减免手续费等利好政策,为国家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添动力”。

(三)坚持以创新为动力

模式创新是提升支农履职能力和水平的关键。要大力推广依托政府信用基金、进出口贸易订单、动产仓单质押为主要风控措施的成功经验,积极借鉴“经纪人”“粮港通”“保值贷”等模式,在完善风控措施基础上,积极探索推广新模式、新路径,让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优势充分体现到服务粮食安全的各个环节。

(四)坚持以服务为手段

一是用好银企直连平台。充分利用农发行

与中储粮银企直联业务系统,着力保障中储粮总公司及其直属企业资金支付、汇划等业务,确保资金集团资金集中管控。将银企直联结算系统逐步推广运用到地方储备企业,进一步提高农发行金融服务质效;二是用好网上银行平台。加大网上银行推广力度,特别对有夏秋粮收购、储备粮轮换、成品粮交易等业务的重点企业,鼓励通过农发行网银办理业务,确保及时高效满足企业资金汇划需求;三是用好柜面服务平台。着力提升集中运营管理水平,注重临柜人员综合业务能力和素质培养,加大柜面业务宣传,精简业务流程,确保让客户最多跑一次,提升客户满意度。

(五)坚持以风控为基础

一是强化封闭管理。要坚持和发展农发行粮棉油信贷封闭管理理论,对于粮食储备贷款和调控贷款的管理,不折不扣落实“库贷挂钩、封闭运行”。对于粮食市场化收购,既要满足企业快购快销、即购即销的特点,又要不断探索先进的服务方式和手段,创新完善封闭运行管理制度,确保专款专用;二是加强库存监管。充分利用粮棉油远程监控系统,实时监测粮食库存变化情况,提高粮棉油信贷管理效率,有效防控信贷风险;三是强化联合检查。持续加强与发改、粮食等部门和单位联合开展年度储备粮食库存检查,扎实开展政策性粮食库存大清查,摸清底数,查缺补漏,夯实储备粮管理基础,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摘自《甘肃金融》2020年第10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赵先立,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甘肃省农村污水治理 投资模式研究

王彩艳 苏都都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内容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福祉建设和政治建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农村领域需要弥补大量的基础设施短板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农村污水治理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要完善农村污水治理设施且落实后续的维护及持续的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必须建设与之匹配的污水治理投资模式。目前我国农业农村领域的资金供给方式主要有财政投资、农民集资、民间资本或集体经济投入等，其中又以财政投资和农民集资这两种方式为主。农村污水治理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投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迫切，农村污水治理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政府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赵芳等在分析日本农村污水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日本经验对中国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借鉴。矫旭东等在分析农村水环境治理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国内外农村水环境市场化治理经验，提出农村水环境市场治理机制的基本思路和对策。王亦宁简要分析了当前农村水环境治理引入 PPP 模式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要考虑农村水环境项

目与其他农村项目的关联性，配套实施相关水环境治理措施。王天鸽研究了农村水环境自主治理模式，他同时也指出，政府在自主治理模式中更应该发挥功能性作用，并提倡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水环境自主治理。郭桂玲研究了农村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情况，认为农村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作用较大。王定祥运用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机制构建中的功能定位，提出了乡村振兴中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机制与模式，基本结论是，在依托现代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中，政府应在公益性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要激励市场机制在私益性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要激励市场机制在私益性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决定作用。

本文以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研究了甘肃省农村污水治理投资模式。甘肃省区域面积广阔，农村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都各不相同，单一的污水治理投资模式无法满足全域需求，因此，本文将甘肃省农村地区分为四类，不同类型的地区对应不同投资模式，力求治理能有的放矢，为解决甘肃省农村污水治理提供参考。

表 1 甘肃省农村污水处理现状(2017)

名称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乡/镇		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率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个数(个)	比例 (%)	个数(个)	处理能力(万 m ³ /d)		
乡	87	18.05	5	0.02	8.16	5.06
建制镇	140	22.65	28	12.21	29.4	11.06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城乡统计年鉴(2017年)。

二、甘肃省农村污水治理现状及投资现状

(一) 甘肃省农村污水治理现状

甘肃省共有 482 个乡, 618 个建制镇, 目前建制镇污水处理能力较好, 乡村污水处理厂数量少, 污水处理率低。乡污水处理率 8.16%, 且只有 5.06% 的污水是由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的, 大部分的污水经由各种途径排入土壤、河流甚至水源地, 既影响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环境, 也影响到农作物和农产品的质量。

农村污水主要分为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 相对来说点源污染比较容易统计和控制, 但是大部分的污染还是来源于面源污染,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地区水污染治理的难度。

(二) 甘肃省农村污水治理投资现状

甘肃省目前对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 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 只有极少数的村庄自筹资金进行污水治理。政府财政用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上的量也很有限。从下图可以看出, 2015—2017 年, 政府财政用在农村污水处理的比例为 1.54% ~ 2.06% 之间。

表 2 甘肃省农村污水处理政府投入情况

	(单位: 万元)		
	乡、镇、村庄建设投入	污水处理投入	占比 (%)
2015 年	3024145	10474	1.54
2016 年	2466272	7991	2.06
2017 年	3009999	12531	2.0

数据来源: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乡统计年鉴 (2015—2017 年)。

政府要加大力度治理农村污水, 财政需要投入的较大, 甘肃省经济增长缓慢, 各级政府财政压力较大, 很难在短期内提高污水治理效果。

(三) 甘肃省农村污水治理存在的问题

1. 农村水污染治理缺乏可持续激励的机制。由于各地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差异, 导致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存在质量不过关、运行维护成本过高等问题, 直接影响了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的使用寿命和效益。

2. 对政府投资的过分依赖。目前甘肃省农村污水处理还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 对村民缺乏最基本的环境保护责任和约束。村民由于经济收入不同, 对水污染治理的参与度不同, 付费意愿也不一致。

3. 政府财政压力加大。虽然 2019 年政府已经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政府重要的工作之一, 但是在短期内, 投入大量中央财政到农村污水治理, 对政府来说压力太大。

4. 农村环保意识差。经过调查问卷发现, 大部分村民都意识到了污水影响其生活质量, 但是对于具体的治理, 甚至有些伤害到部分村民现有利益的措施提出, 村民还是表现出不配合和不理解。这种观念对以后的持续治理会产生负面影响。

三、农村污水治理投资模式

农村污水治理是一项需要长期投资的工程, 政府和市场必须有效分工、协同合作才能在乡村振兴中构建起高效的农村污水治理投资机制。专门针对农村污水治理投资的模式目前理论界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参考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主要的代表性模式有四种。

(一) 政府主导型

传统的农村污染治理大多是政府主导型为主, 农村污水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是其制度保障。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 是指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 统一协调, 各级政府按不同的比例投资进行污水治理。单个农村污水量往往难以规模化, 很难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治理, 所以政府一直是农村污水治理的主力资。同时, 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评价体系, 将农村污水治理作为政府考核指标, 以督促各级政府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和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避免了个体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牺牲生态环境的弊端, 但是, 目前, 我国水污染治理存在多部门共管的局面, 住建、农业、环保、水利、卫生等部门均有专项

资金投入,造成了资金的浪费和重复使用,也是造成农村环境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表 3 甘肃省农村地区分类

类别	地区
经济、生态良好型	夏河县、成县、迭部县、华亭市、庆城县、徽县、临夏市、天祝县、崇信县、碌曲县、玛曲县、环县、合水县、合作市、华池县
经济良好型	民乐县、景泰县、山丹县、永登县、永昌县、民勤县、榆中县、高台县、阿克塞县、玉门市、肃北县、临泽县、皋兰县、金塔县、敦煌市、瓜州县、皋兰县、肃南县
生态良好型	积石山县、礼县、东乡县、西和县、岷县、宕昌县、和政县、广河县、康县、康乐县、渭源县、张家川县、秦安县、甘谷县、临夏县、漳县、武山县、舟曲县、庄浪县、文县、临洮县、泾川县、临潭县、宁县、静宁县、陇西县、正宁县、卓尼县、镇原县、清水县、灵台县、两当县
普通型	通渭县、会宁县、古浪县、靖远县

(二) 市场主导型

市场主导型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尝试用市场途径来解决农村污水治理问题。其核心是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民间资本以生态环境使用权或其他便利为前提,投资进行农村污水治理。目前甘肃省已经有签约的农村污水治理 PPP 项目,这些项目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和管理成本,同时也提高了民间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农村污水治理比较特殊,既不属于完全的盈利性质,也不属于完全的公益性质,所以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一般。所以需要政府将一些盈利性的项目跟污水治理项目进行捆绑,给市场足够的回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市场积极性。

(三) 社区投资模式

农村社区是指以村庄为中心,全村村民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同一个社区内部,农民经济条件相当,对环境的诉求基本一致,相互之间也有较强的信任感。社区投资模式更好地贯彻了“谁污染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能起到更好的监督作用,也能避免投资浪费。社区投资模式以村为单位,可以统一规划,集中治理,减少成本,还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减少浪费,使农民从水污染的制造者变成了污染治理的主力军和监督者。

农村社区是区域环境利益的社会共同体,便于政府与农民之间沟通,这种投资模式在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比较适用。

(四) 政府、市场、乡村协同投资模式

协同投资模式是指政府、民间资本、乡村等社会治理要素以不同的形式协同合作,共同参与农村污水治理投资。协同投资的模式强调政府、民间资本和乡村各自发挥其最主要的功能,政府做好政策协调和平台支持,民间资本和乡村作为投资主力,积极参与农村污染治理。这种模式最大地发挥了政府、市场和农民的力量,尽可能调动一切资源。其中,政府、民间资本和乡村投资形式比较灵活,政府的主要作用还是以政策性为主,民间资本有选择性地进入农村污水治理项目,经济条件较好的乡村也可以和民间资本共同投资,共同受益。

农村污水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协调各方利益。归纳起来,政府、民间资本和乡村的协同投资模式最为先进,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都适用这种投资模式。每个地区生态环境、经济条件和农民的治污意识都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本文将甘肃省农村地区进行了分类,不同的地区可以选择最适合的投资模式。

四、甘肃省农村地区分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中明确指出应该“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分类施策,根据发展现状和需要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所以,应该根据不同乡村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农村分类是让农村水污染治理落到实处,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甘肃省幅员辽阔,农村地区差异也较大。鉴于农村水污染治理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及教育水平之上,所以本文将甘肃省农村地区分为三类,以求每一类地区对应不同的污水处理模式。

国内外关于农村分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较多,但是目前对于农村分类发展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各种分类方法也不一致。本文借鉴熊凯对江西省进行分类的方法,在文献基础上,依据农村的区位特征、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自然、经济和社会多项因素,采用科学分类方法,将甘肃省农村地区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类型提出各有侧重点的农村污水处理投资模式。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政策实施的可操作性以及甘肃省的具体情况,本文主要从县域的角度出发,将甘肃省农村地区进行分类。其中,一级指标为人均 GDP,二级指标为年降雨量 400mm 分界线,同时考虑各县的文化及历史遗迹和交通可达性。按这些指标,将甘肃省农村地区分为经济生态良好型、经济良好型、生态良好型和普通型。

经济生态良好型地区,经济状况较好且生态条件也较好,政府和民间资本都能较好的进入,这一类型的地区污水处理状况较好,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较足,且农民治污积极性较高,也有能力和意愿参与农村污水处理,这种类型的地区,政府主要以政策引导为主,投资的主力是民间资本,农民社区作为补充,解决对民间资本吸引力不足的地区的污水处理问题。

经济良好型地区人均收入较高,但是生态条件有限,对民间资本的吸引不足。这种地区有较多的资金可以投入到农村污水处理中,政

府主要以引导为主,鼓励农民社区加大污水处理投资力度。政府通过一些优惠政策,提高乡村社区参与污水处理的积极性。

生态良好型地区,经济条件有限,但是当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较大,这类型的地区主要以引入社会资本为主,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和监督管理力度,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当地农村污水处理项目。

普通型地区,人均收入不高,生态条件也有限,乡村环保意识也有限,这类型地区很难吸引民间资本,同时乡村社区自主治理难度也较大,所以政府应该成为投资主力。在污水处理过程中,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尽可能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以科技支持、创造进一步的学习机会等手段吸引农民自己参与污水处理。

五、结论

农村污水处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作为经济比较落后的甘肃省,长期依赖政府投资来进行污染治理的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形式。本文以经济条件和生态条件为衡量标准,将甘肃省农村地区分为四类,每一类地区都侧重点不同的对应不同的投资模式。在经济条件和生态条件都较好的地区,应该主要以民间资本和乡村社区投资为主,政府主要提供政策支持和平台;在经济条件较好但是生态条件较差的地区,应主要以乡村社区投资为主,同时积极改进生态环境吸引民间资本;经济条件较差但是生态条件好的地区,应主要以引入民间资本投入为主;还有一些生态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比较差的地区,政府应该成为当地的投资主力,加大农村地区污水处理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摘自《甘肃农业》2020 年第 10 期)

张芳胜/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王彩艳,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省老旧小区改造情况调研报告

康 宾

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部署,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怀的一件大事。7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强调“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内需、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深入了解甘肃老旧小区改造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难点和问题,近期,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联合兰州、张掖、嘉峪关、天水、白银调查队,在以上五市开展了专题调研。此次调研走访了省市住建部门了解总体情况,抽选了15个已改造的老旧小区和其中的171户住户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结果显示,甘肃城镇老旧小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亟需改造小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改造工作推进过程中亮点频现,但工作推进中仍存在“五难”,亟需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一、现状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民生福祉,又是一项全新工作。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甘肃省在全国较早出台了《关于推进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暂行)》,省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稳步推进,积极争取国家补助资金,努力将这项惠民政策实施好。

(一)积极出台政策,明确改造目标、范围及标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于2019年4月份下发文件,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给予中央财政补助,在

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甘肃省住建厅根据掌握的国家政策导向,经充分论证研判、意见征询,于2019年12月23日在全国较早出台了《关于推进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暂行)》,围绕明确“改什么、怎么改、谁来改、如何改”的全流程体系对各市州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行指导和规范,2020年5月6日,按照省政府安排部署,省住建厅又制定印发了《甘肃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专项实施方案》。

开展调研的五市均按照国家 and 省上要求,结合自身特点,出台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老旧小区改造的目标、范围、改造内容及标准、资金来源和后续管理等方面的解决方案,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稳步推进,积极争取国家补助资金

按照国家要求,省住建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指导各市州按照分批实施、逐年推进的原则,分别于2019年5月、2019年11月报请省政府同意后,向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上报并列入2019年、2020年国家改造计划:2019年全省改造城镇老旧小区7.92万户;2020年全省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7.45万户。截至7月20日,已累计争取国家补助资金37.3亿元。2019年25个续建项目全面开工建设,累计完成投资7.25亿元;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17.45万户,整合为79个项目,已全部进场施工,累计完成投资2.74亿元。

(三)克服困难,加强协调督办

2020年受疫情防控影响,甘肃省各地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前期审批、群众意见征询、进场施工等均受到一定影响。3月份以来,结合全国以及甘肃省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省住建厅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指导各市州抓紧推动复工复产。针对2020年老旧小区项目受疫情影响,审批进度慢的问题,省住建厅与省发改委协调会商,于3月份联合下发了督办通知,在督促各级住建部门加快可研编制、报批的同时,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的加快审批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力求形成合力,为项目顺利建设、形成有效投资创造条件。

(四) 强化多种措施,严格质量控制

各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严格执行工程项目建设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确保改造过程依法依规,质量达到国家建筑行业规范标准。各市采取适合当地的一些做法,加强各方面沟通,严格质量监督,达到让居民满意、改造有效的目的。如白银聘请群众监督员,全程进行跟踪监督,保证了居民对维修改造工作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共同做好质量管理。

二、亮点和期盼

(一) 亮点

1. 小区居民参与度较高。小区改造过程中,管理单位、施工单位与社区服务中心及居民积极对接,了解群众所思所想,优化施工方案,多方协作配合,最大限度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满足群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对15个已改造老旧小区和171户住户调研结果显示,对老旧小区治理改造内容非常了解的占17.5%,比较了解的占58.5%,一般了解的占17.5%,不了解的仅占6.4%。

2. 所有居民认为居住体验明显提升,满意度高。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老旧小区外观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功能进一步完善,小区居民居住体验明显提升。冬季室内供暖温度提升3—5摄氏度;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得到了拆除,建筑物整齐有序,道路平坦宽敞,居民出行更加顺畅;智能门禁系统的安装,使小区治安防

控更有保障;部分小区解决了大型消防车无法进入的消防安全隐患等历史遗留问题。本次调研的171户住户,认为小区改造后居住体验显著提高的占52.6%,居住体验有所提高的占47.4%,共计100%。对小区改造效果评价满意的占52.6%,一般的占32.2%,暂时无法判断的占13.5%(小区正在改造尚未完工)。居民从开始的质疑、不满到现在的理解、配合再到满意,整个过程承载了住建部门和街道、社区的不懈努力。据白银市一社区负责人介绍“小区改造前期,社区进行了入户走访,征求居民意见,将居民关注的上下水、供暖、小区环境等问题及时与上级部门和施工方对接,争取做到让群众满意”。

3. 改造与管理并进。很多老旧小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物业管理单位,改造后,物业主管部门及时把小区纳入物业管理范围,强化对小区改造后的各项管理工作,实现了建设与管理有机结合,为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服务保障。嘉峪关市把老旧小区改造和小区外围街区整治相结合,加大生活毗邻区垃圾乱倒、乱堆乱放、非法小广告、占道经营治理力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店外“门前五包”责任制,使老旧小区改造后从内到外整洁有序。

(二) 期盼

1. 老旧小区居民改造意愿强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主要以建成区范围内2000年以前建成小区且失养失修失管严重、配套设施不完善、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为主。由于老旧小区房屋建设年代较早,楼房外墙无保温设施、屋面防水部分破损;用户能源管网、架空电力线路等设施陈旧老化;单元门损坏、楼梯间涂料脱落、楼梯扶手破损;小区道路老化,场地铺面破损严重、停车位不足、消防设施被损坏等,已无法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基本需求,影响小区景观及生活环境的舒适性。老旧小区居民有强烈的改造意愿,调研显示,98.3%的居民支持老旧小区改造。

2. 八成以上的居民希望改造基础设施。很多老旧小区开发建设之初,规划比较简单,管理养护不及时,造成了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公共设施不配套等问题。在问到“您认为最需要改造或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时,82.5%的居民希望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如对供热管网及设施、对排水管道及设施、小区道路、小区绿化美化等进行改造。天水市进步巷社区建委家属院小区建造于80年代初,因下水管道年久失修,导致下水道堵塞,污水外溢的情况严重,给居民的生活带来较大的不便和困扰。再加上管网破旧,上下水、电网、煤气、光纤等设施,要么缺失,要么老化非常严重,居民反映非常强烈。

3. 公共设施紧缺亟待完善。老旧小区由于建造时间较早,小区很多公共服务是缺失的,比如无养老、抚幼、文化娱乐、健身、医疗等场所,机动车停车位严重不足,非机动车乱放等问题普遍存在。天水市进步巷社区胜利巷小区由于建造时间早,在规划建设时就没有对公共停车区域进行合理规划,导致一直没有停车位,同时也没有养老、医疗等各种公共设施。而老旧小区居住的老年人比例较高,对配套服务设施的需求更为紧迫。调研显示,有54.4%的居民希望对公共设施进行改造,希望改造公共空间、改善环境绿化、增加养老和医疗服务、增加停车位、增加充电设备、健身器材等。

调研显示,有32.2%的居民希望对年久失修的房屋进行整修;24.6%的居民希望对安全消防通道、器材等进行整修配备等;21.6%的居民希望加装电梯;16.3%的希望进行“适老化”改造。

三、难点

(一)资金筹集难。一是地方配套资金难以保证。甘肃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资金、中央预算内配套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但甘肃由于地方财政紧张,配套资金难以保证,影响改造项目进度;二是管线运营单位和原产权单位参与积极性不高;三是居民出资意

愿不强。本次调研中访户时提及“您是否愿意配合政府改造,自己出一部分费用?”仅40.4%的居民表示“只要费用合理,非常愿意”;24.6%的居民表示“愿意少量出资”;35.1%的居民表示“不愿意,这是政府应该承担的”。白银区计划让老旧小区居民每户出资10元,参与到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但部分居民等、靠思想严重,过分依赖政府财政投入,仅10元都不愿意出,认为这是政府的事。由于资金筹措难,造成项目资金缺口较大。以张掖市甘州区宝迪花园老旧小区改造为例,该项目是甘州区2020年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重点偏向小区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该项目施工中标价为1413.30万元(不含前期费51.1万元),现补助资金仅到位707万元,因后续补助资金暂未落实到位,且具体到位情况不明确,致使项目实施进展缓慢。

(二)小区改造众口难调。走访中发现小区居民思想认识有差异:一是部分居民参与公众事务的意识不强,对小区改造工程不参与也不关心,坐等政府推动。二是由于小区居民之间自身思想素质、文化差异、个体需求差异等原因,对改造的内容、标准等方面众口难调。三是个别居民担心影响自身利益而强烈反对小区改造。据一街道人员反映,由于改造中需要对小区内违章建筑进行拆除,影响了一些居民的切身利益,从而激发矛盾,居民意见统一困难。在张掖市调研中也发现某信用社小区内的供暖管网已改造,但因个别住户意见不统一,卡在了入户环节。

(三)部门协调难度大。老旧小区改造更具有复杂性,涉及规划、住建、电力、通信、消防、城管、社区、物业等较多部门单位,协调不好,重复改建等问题将会出现,工期难以保证,造价亦将增加。多部门协同建设,协调难度大。调研中有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楼栋存在违章建筑和高压线,建设单位多次与城管执法局、街道、电力部门沟通,协调难度大,无法按时解决问题,影响项目正常推进。

(四)地域限制使小区整体环境难以高质量提升。现在改造的老旧小区为2000年前建造的小区,当时规划不合理,小区面积小,留的空地少,改造提升受到地域限制。白银农委家属院作为提升型改造试点小区,改造内容涉及供电、供气、供热、房屋防水、照明、围墙等基础设施,新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爱心超市等惠民设施。据社区人员反映,在规划中还设想建一座文体活动室,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但由于地域限制,活动室也随之夭折。

(五)多层加装电梯工作难度大。多层加装电梯是这次调研中群众反映意见最集中、愿望最强烈,也是意见分歧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调研了解到,有21.6%的居民有加装电梯的需求。在走访中问及“是否愿意加装电梯”,居民意见各异:居住高楼层年龄偏大、家有老人的或有行动不便的居民强烈要求装电梯;低楼层觉得挡光不通风不愿装;有居民习惯爬楼锻炼身体,觉得装电梯没意义;有居民认为费用太高。在兰州加装电梯要书面征求本楼或本单元全体业主的意见,全体业主同意方可加装电梯,但同一单元各家经济状况不同,加装电梯往往很难达成一致,大多数居民加装电梯的愿望难以实现。兰州市目前还没有出台切实可行的老旧小区多层加装电梯的具体政策办法和明确负责的落实单位。据兰州市西固区兰炼辰光小区居民反映,小区电梯加装完成以后每部电梯除去每年要交5000元的维护费给电梯公司,还要每年向物业公司缴纳2000元的管理费,后期费用还会不断增加,无形中加大了居民的负担。

四、问题

(一)老旧小区改造与居民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受资金限制,老旧小区改造不能够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嘉峪关市部分居民希望更换老旧门窗,但施工方案里面不包含此项内容。市政府对老旧小区住宅室内厨卫改造“以奖代补”每户补贴3000元,由于申请条件为单元同侧的所有业主均同意改造方案后才可以实施,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家情况不同,很难达成一致,政府“以奖代补”政策实施起来操作性不强。如果将厨卫改造补贴政策调整为更换门窗补贴可能更受群众欢迎。

(二)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和业主缴纳物业费意识有待双双提升。老旧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不发挥作用的现象较为普遍,本次调研选取的15个小区中有8个没有业主委员会,占53.3%;有43.3%的居民表示居住的小区没有物业,有7.6%的居民认为小区物业管理情况差,28.1%的居民认为小区物业一般,仅有21.1%的居民认为自己居住小区物业管理良好。调研了解到,一方面,部分老旧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作用没有很好发挥,使小区业主的利益不能得到维护,小区物业管理难以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很多老旧小区没有物业,业主缴纳物业费意识淡薄,使改造后的小区物业运行困难,造成物业公司不愿进驻等问题比较突出。如嘉峪关布嘉恒物业(国企)所管理的部分小区物业费0.3元/平方米/月,造成企业亏损,影响服务质量;而小区居民因为以前不缴纳物业费或者缴纳很少物业费,物业公司进入后业主没有缴纳物业费的观念,个别人不愿意缴纳物业费,影响物业管理和服务。白银部分小区业主不缴纳物业费,街道办、社区只能在政府的补贴下承担日常保洁,不仅增加了街道办和社区工作负担,也不利于小区长期管理维护。

(三)施工进度及施工管理需要加强。部分老旧小区改造是跨年工程,受疫情影响,今年各施工单位开工时间比往年晚了2个月,给居民的出行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部分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管理不到位,造成小区居民的地下室塌陷、车辆刮损、墙面污损以及垃圾清理不及时等问题,个别居民意见较大。

(四)部分小区违章建筑拆除难度大,影响施工。有的小区楼顶或一楼公共区域有私人搭建的违章建筑,拆除难度大,屋面防水和公共绿

化无法实施。个别老旧小区地面也存在大量违章建筑和设施,严重影响管道线路施工进度。

(五)有的市电梯加装需求得不到满足。嘉峪关市电梯加装补贴政策为每部电梯省级财政补助10万元,市级财政给予10万元的配套补助,其余费用由住户平均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条件是2000年以前建成且在6层以上的楼房,只要符合加装条件都可以加装,没有数量限制;2000年以后建成房屋加装电梯每年只有15到20部限额。从目前加装情况来看,嘉峪关市2000年以前建成的房屋加装电梯工作由于楼层等各种原因达不到加装条件,目前加装数量为零;2000年以后建造的楼房,申请加装电梯的单元目前有60个左右,2020年嘉峪关市配额20部,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五、思考与建议

(一)建立项目协调推进机制,提高施工各方协作程度。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比较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应建立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议事机构,明确规划、建设、城管、环保、物价、广电、消防等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纵向从政府到社区、横向涵盖各有关职能部门的科学运行机制,形成高效、科学的改造建设管理模式,确保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顺利推进。提高施工各方协作程度,确保改造方案科学完善,执行顺畅,不走样,不留死角。如嘉峪关市由于改造资金来源、项目名称不同等原因,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由市住建局、市房产服务中心、市嘉恒公司三家单位分别组织实施,在同一个小区有三家单位同时进行施工。为了保证同一小区改造效果,三家单位积极沟通协调,共同商定改造方案,对小区的路灯、砖石、绿植等统一规格、统一品牌,保证了小区改造的整体一致。此外,针对改造中涉及到各种问题,施工单位与电力、供暖、供水、供气、通讯等各部门多方联动,协作发力,为按期完成项目施工任务提供了保障。

(二)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发动小区业主主动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涉及小区内各个方面,要处理好业主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需要街道、社区和原建设单位大力配合,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加强政策宣传,做好居民思想引导,营造良好的建设环境,确保项目顺利实施,防止出现各类滋事和纠纷的发生。同时,要充分注重信息公开,及时向小区业主公布改造工程项目的各类信息,提高业主参与度。一是改造时组织业主全程参与,由业主就改造内容和小区后续管理充分讨论,调动业主积极性;二是对于没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由社区居委会组织及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由业委会负责与居民充分沟通,做好群众思想工作;三是充分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的带动引领作用,争取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三)建立小区管理长效机制,确保小区和谐运转。老旧小区改造不仅仅改造的是硬件设施和小区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做好改造小区的后续管理,避免“前改后乱”现象。要充分发挥街道和社区的协调推进作用。对于已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加大对物业公司的管理力度和考核措施,实行优胜劣汰,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对于物业管理不健全的小区,及时招标引进物业公司。政府也可协调引进大型物业企业进驻新建小区,通过联帮带的模式带动1—2个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同步健全物业服务体系,保证改造效果。宣传引导小区居民树立享受了良好的物业服务就要付出相应的酬劳,要建立交物业费的概念。同时,对困难群众较多、管理矛盾突出的小区,既要做好扎实细致的群众工作,也要及时制定城市困难职工物业费和水、电、气等收费项目的优惠减免政策,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多措并举,加强资金保障。鉴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长期性及其所需资金的巨量性,应坚持“权责统一、各方共担、政府投入和市场化运作并存”的原则,在积极争取国家补助资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加大财政投入,千方百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老旧小

区改造,发挥社会资本作用;争取金融部门支持,争取低息贷款;采取专项补助、居民自筹、物业维修基金、社区停车位出租等多种方式,拓宽渠道筹集改造资金。积极探索建立政府、原产权单位、居民、市场多方筹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的机制。

(五)加强施工队伍管理,加快施工进度和质量验收。加强对施工队伍的管理,在施工过程中做到文明施工,垃圾清运及时、不随意切断通行道路、不损坏居民财物等,加快施工进度,尽量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小区改造完工后,要征求小区居民意见,完善施工过程中没有想到的地方,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把老旧小区改造的民心工程做实做好。

(六)强化监管,加大违章建筑拆除。城市管理职能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对违章建筑和设施依法依规进行拆

除和清理,绝不手软,彻底解决困扰人民生活的顽瘴痼疾,为老旧小区改造的顺利实施开辟道路。

(七)用活用好国家政策,解决群众所盼。7月10日,国家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十四五”期间老旧小区改造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甘肃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用好用活国家政策,积极探索老旧小区改造方面的好办法,解决老旧小区居民期盼解决的一系列问题,逐步提升老旧小区整体功能,让群众生活更加舒心。

(摘自《调查与研究》2020年第11期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康宾,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

(上接第13页)培养培训,扶持高层次专业网络营销团队,使其逐步掌握应用直播电商、认购预定等新模式,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把直播带到“田间地头”,打造“网红”品牌,利用巨大“流量”缓解产品集中上市的滞销难题。

3. 加快运输领域资质证照电子化,优化城市配送车辆通行停靠管理,落实物流领域税费优惠政策,规范快递收费价格,降低物流成本。

4. 大力推进农村物流服务工作,使我省“电子商务+特色农业”等农村物流和特色产业、生产加工项目获得政策支持。在具备条件的乡镇建设快递物流园区,补齐贫困乡村运输短板,推动我省农村物流网络体系发展,帮助贫困地区乡镇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

(六)深入实施“甘味”品牌战略

1. 开展多形式品牌产品展销和洽谈对接,

组织和支​​持企业抱团出省、抱团出国,扩大“甘味”品牌的影响力,帮助企业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设立品牌展示和销售窗口。同时通过政策倾斜,鼓励发展“农校对接”、“农超对接”等模式,构建产销体系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

2. 总结首批认定的“甘味”品牌市场运作成功经验,继续健全评价体系,对“甘味”品牌进行动态考核,把更多的优特农产品纳入“甘味”品牌目录,打遣“陇货”团体的名牌效应。

3. 建立“甘味”品牌质量监管体系,应用条形码、电子标签对农产品进行质量溯源,同时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对“甘味”品牌实施质量动态监管,提升“甘味”品牌市场影响力。

(摘自《调查与研究》2020年第10期
张芳胜/摘编 武新力/校)

甘肃居民收支与生活状况报告

黄馨仪

一、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情况及特点

2019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323元,同比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29元,同比增长9.4%。甘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 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

2019年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继续坚持抓培训、促就业、保增收的工作思路,积极落实各项就业政策,健全完善促进就业政策体系,加强创业带动就业,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力度,为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继续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1708元,同比增长8.9%,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7.2%,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75.1%,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5.9个百分点,仍是促进城镇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

资增长指导线上调,有效保障了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增加;二是行政单位考核奖、科学发展观奖励增加、部分企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和年终奖金标准提高,带动全社会整体工资水平提高。

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769元,同比增长9.3%,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8.8%,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8.4%,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2.7个百分点,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是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全力实施,以及城镇化、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新型农村社区的大力建设,农村居民就地就近务工机会增多;二是加强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部分企业为缓解用工荒,采取了提高工资、发放加班补贴等措施,推动了农村务工人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甘肃农民工总量达425.4万人,同比增长2.2%。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长6.1%。

2019年甘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构成表

指标名称	绝对值(元)		增速(%)		比重(%)		拉动增速(%)		贡献率(%)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可支配收入	32323	9629	7.9	9.4	—	—	—	—	—	—
工资性收入	21708	2769	8.9	9.3	67.2	28.8	5.9	2.7	75.1	28.4
经营净收入	2484	4322	6.4	13.0	7.7	44.9	0.5	5.7	6.3	60.4
财产净收入	2539	130	0.5	-38.8	7.9	1.3	0.1	-0.9	0.5	-9.9
转移净收入	5592	2408	8.3	7.8	17.2	25.0	1.4	1.9	18.1	21.1

(二) 经营净收入保持平稳增长,收入来源更加多样

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2484元,同比增长6.4%,占可支配收入的7.7%,对

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6.3%,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0.5个百分点。在“三新”经济的引领以及税费改革、全域旅游等政策推动下,甘肃创业环境不断改善,减税降费等普惠性政策落地,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较快发展,税负减轻,居民自主创业参与度提高,促进了城镇居民家庭经营持续发展。

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4322元,同比增长13.0%,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44.9%,四项收入中占比最大,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6.3%,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5.7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增长13.0%,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增长8.2%。2019年甘肃畜牧业生产稳中有进,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助推了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净收入快速增长。2019年全省牛、羊、禽存栏同比分别增长4.0%、5.4%和7.1%;出栏同比分别增长6.4%、5.8%和14.5%,价格同比分别增长5.3%、17.9%和9.5%;猪存、出栏同比分别下降11.9%和6.2%,价格同比增长39.3%。

(三)财产净收入增长缓慢,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较低

2019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2539元,同比增长0.5%,占可支配收入的7.9%,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0.5%,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仅0.1个百分点。随着房地产调控和减息政策的实施,存款、理财利率下降,个人消费信贷增多,房贷、车贷等生活消费利息支出增加,使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幅收窄。

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130元,同比下降38.8%,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仅为1.3%。

(四)多因素促进转移净收入增长较快

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5592元,同比增长8.3%,占可支配收入的17.2%,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8.1%,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1.4个百分点,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第二大动力因素。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专项附加扣除等改革,有效降低居民税收负担,养老、医保、低保等各项补贴政策相继提高标准,惠及不同群体,政策性促增实现全覆盖,是促使转移净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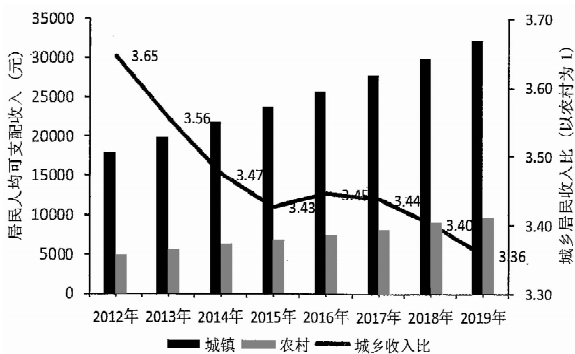
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408元,同比增长7.8%,占可支配收入的25.0%,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21.1%,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1.9个百分点。人均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外出从业人员寄带回收入的增长,以及农村综合补贴、医保补助、农村基本养老等政策性补助标准的提高,带动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增长。

二、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9年甘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1.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3.36:1,比上年下降0.04,比2012年下降0.2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状况进一步改善。

三、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脱贫攻坚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坚决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因地制宜、创新思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就业、金融、医疗、教育等扶贫力度,助推贫困村、贫困户发展产业:促进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据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甘肃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92元,比上年增加904元,增长11.8%,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2.2个百分点,较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2.4个百分点,脱贫攻坚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为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2—2019年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对比图

四、2019年甘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消费亮点突出,生活质量明显改善。2019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54元,同比增长8.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94元,同比增长6.9%。

从生活消费支出构成看,城镇八大类消费全面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交通通信,绝对值为3050元,增速高达24.6%;人均居住、食品烟酒、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消费保持平稳增长,分别为5622元、6996元、2555元和632元,分别增长11.1%、7.8%、4.7%和4.6%。医疗保健、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分别为2224元、1920元和1455元,分别增长0.8%、0.7%和0.6%。农村“八大类”消费支出“七升一降”。生活用品及服务类增长最快,为578元,增速达12.4%;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类消费支出呈两位数增长,分别为1196元和1331元,分别增长10.9%和10.7%;居住、食品烟酒、医疗保健增长也较快,分别为1867元、2827元和1183元,分别增长8.2%、4.9%和4.5%;生活用品及服务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为162元,增长1.8%;衣着略有下降,为552元,同比下降1.1%。

(一)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态势突出

1. 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数据显示,甘肃城乡居民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发展型消费比重提高。2019年,甘肃城镇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14538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9.4%,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发展型消费支出6915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8.3%,同比提高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5246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4.1%,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发展型消费支出2526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6.2%,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

2. 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一方

面,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城乡居民物质性消费基本得到满足。2019年城镇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农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家庭的“大件”基本普及,家电全面普及,另一方面,物质性消费得到基本满足后,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据统计,2019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10895元,增长7.6%,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4.6%;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3861元,增长9.9%,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9.8%。

(二)消费热点频现,提档趋势明显

1. 食品消费趋于健康便捷。一方面随着家庭收入越来越富裕,居民享受“舌尖上的甘肃”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健康。2019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蔬菜和食用菌、肉类、禽类、水产品支出分别增长7.1%、0.6%、13.3%和23.3%,用于酒类和食用油支出小幅下降;农村居民人均肉类、禽类、水产品支出分别增长7.8%、36.7%和10.6%;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外卖平台用户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传统餐饮模式正在转型,2019年城乡居民人均饮食服务消费增长明显,分别同比增长21.1%和13.0%。

2. 交通消费旺盛。汽车快速进入寻常百姓家,2019年甘肃城乡居民每百户拥有汽车数量分别为32辆和22辆,同比增长6.7%和8.0%。在此背景下,2019年甘肃城乡居民人均交通用燃料分别增长13.3%和5.0%,交通工具使用及维修消费支出分别增长16.1%和5.6%。这说明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推动了自有交通工具消费支出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甘肃城乡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成效明显,出行更为便捷。

五、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甘肃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差距依然较大

近年来甘肃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但绝对差距却随着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呈扩大态势,促进城乡居民增收依然任重道远。2019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二十九位,高于黑龙江省1378元、吉林省24元,居全国倒数第三位,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为10036元,比上年扩大74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最末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392元,比上年扩大579元。

(二)城镇收入增长对政策依赖较大,内生动力不足

拉动甘肃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中,发放机关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提高离退休金标准、扶贫资金转移力度加大等政策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工资性收入是甘肃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达七成左右,而工资性收入主要依赖政策性工资调整和年终绩效考核等奖励,2019年甘肃出台的增资政策提升收入效果依旧不明显,已落实的增资等增资政策也是全国性政策,对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与全国其他省份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下社会就业和薪酬提升、家庭经营收入等增长较为乏力,城镇居民收入内生动力不足,制约了收入的增长。

(三)城镇经营净收入增收效果有限,后劲不足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家庭逐渐增加,但居民参与的经营活

性成本增加,利润空间受挤压,这些都给个体和私营经济带来困难和不确定性,后劲不足,制约了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

(四)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增长动力减弱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民经济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速有所放缓,继续以直接补贴等形式增加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面临较大压力。当前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低保金等各项惠农政策基本稳定,农业补贴边际效应递减,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缺乏增长后劲。

(五)传统农业生产经营增收动力减弱

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44.9%。其中,一产经营净收入占经营净收入的78.2%,农村居民对农业生产经营依赖性依然较强。目前主要农产品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产量也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而农业经营产业化程度和科技含量有待提高。另外,农业和牧业生产受气候、传染病等偶然性因素影响较大,农业经营收入难以保持较快增长。

(六)扶贫任务依然艰巨

2020年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甘肃省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近年来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甘肃涉及六盘山、秦巴山和藏族地区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越到最后难度越大,贫困程度越深,减贫难度更大,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脱帽,同时全面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可持续性,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依旧面临很大的挑战。

(摘自《省情咨文》2020年第5期)

张芳胜/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黄馨仪,甘肃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



我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近年来,我省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原则,紧紧围绕水环境质量改善这一核心,结合我省地处国家生态环境屏障区和长江黄河源头区的实际,从水污染治理、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3个方面,提出了全省水污染防治工作的12条“工作任务”和8条“保障措施”。建立水质不达标区域约谈机制,针对渭河、泾河、马莲河、石羊河等流域部分考核断面水质不能稳定达标的问题,甘肃省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对相关市政府进行约谈,全面排查入河污染源、制作污染源分布图,科学开展污染综合治理。2020年1至10月,全省38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高于国家平均水质优良比例约17个百分点,劣Ⅴ类水体断面比例为0;18条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为100%;17个重点监管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比例94.1%,如果扣除地质背景值的影响,比例达到100%。

我省着力推进

自然生态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2020年以来,我省按照“减存量,控增量”的总体要求,坚持“污染减排与生态增容”并重,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目标,强化自然生态监管,着力推进全省自然生态保护工作落地见效。我省严肃查处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问题,通过遥感监测和无人机航拍核查,以祁连山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改和生态修复治理已初见成效。通过组织开展“绿盾2020”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有效提升了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质量和水平。截至2020年11月底,全省自然保护区自查发现1845个问题,已整改完成1822个,整改完成率为98.75%。同时,我省组

织完成甘肃省黄河流域1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成效评估工作,掌握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护成效,为下一步整体推进自然保护区监管打下坚实基础。

我省坚持“五个结合”推进消费扶贫

我省把消费扶贫作为带动贫困人口持续增收、巩固脱贫成果、提升产业扶贫成效的重点举措,按照省内与省外、线上与线下、传统与现代、政府采购与市场营销、条条与块块“五个结合”思路,深入开展消费扶贫,掀起了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行动的热潮。截至2020年11月20日,全省销售扶贫产品102.8亿元,贫困人口人均增收约1800元。

近年来,我省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和治本之策,“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已形成规模优势。我省制定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及系列实施方案,在资金奖补、运输物流、农村电商等方面加大力度。先后分7批认定扶贫产品6500个,涉及有贫困人口的县83个,商品价值量438.63亿元。积极拓展消费渠道,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动员250多家“农字号”企业,积极对接东部协作市和京津冀、粤港澳等消费市场,推动以“甘味”品牌为主的扶贫产品走向国内大市场。

我省敲响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槌”

2020年1月1日,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武威市全面借鉴吸收试点地区工作经验,深入推进村镇规划编制,加快农村“三权”登记发证,及时更新城乡基准地价,积极宣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会同县区政府及乡镇、村组,排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筛选

出具备入市条件的5宗农服用地和1宗工业用地,通过严格落实权属调查、征询集体经济组织意见、召开村民大会、实施勘测定界、委托地价评估、拟定工作方案等入市交易程序后,经市自然资源联审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发布挂牌出让公告。2020年11月30日,武威市组织召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启动仪式暨公开出让会,公开出让的6宗101.32亩集体建设用地全部成交,总成交价款656.29万元。这标志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我省敲响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槌”。

“十三五”期间我省知识产权 创造能力显著增强

“十三五”期间,我省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列为首批特色型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试点省。我省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明确提出“严格保护、统筹协调、重点突破、同等保护”的工作原则,有力促进了全省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截至2020年6月底,全省知识产权创造指标与“十二五”末相比,专利申请量达到112335件、增长了119.71%;专利授权量达到51130件、增长了124.32%;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94件、增长了86.08%;全省商标有效注册量达到109911件、增长了219%;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达到134件、增长了127.12%;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达到67件、增长了28.85%;地理标志产品地方标准达到46项、增长了64.29%。

我省积极推进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

我省紧紧围绕“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将“监管强手段,治理补短板”的水土保持工作思路作为甘肃新时期水土保持工作的“两翼”,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狠抓责任落实,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截至2019年底,我省黄河流域累计治理水土流失6.57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到61.35%。其中新修梯田2951万亩,营造水保

林3455万亩,种草1274万亩,封禁治理1233万亩,建成淤地坝1600座,治理小流域1749条,涌现出了庄浪、通渭梯田化县,庆阳南小河沟、泾川田家沟、陇西盘龙山小流域综合治理等许多成功的典型。

我省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 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我省把推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作为拉开架势构建扶贫产业体系、决战脱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小康的重点工程。2018年到2019年,省财政先后整合扶持资金2.39亿元,市县配套3.38亿元,在全省10个市州48个贫困县的1148个贫困村,新建果蔬保鲜库1025座、冷藏车222辆,新增储藏能力37万吨,实现了对有需求贫困村全覆盖。目前,全省已建成果蔬保鲜库4433座,储藏能力达533万吨,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保鲜保值能力,有效化解了滞销风险,有力促进了农民稳定增收。

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体系建设,解决了我省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问题,实现“错峰”销售卖好价。”不仅如此,我省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建设已走在了全国前列,建设工作抓得早、力度大、措施实、效果好,在全国探索出经验,得到了农业农村部的充分肯定。

我省蓝天保卫战取得阶段性成效

据悉,我省自2018年蓝天保卫战启动以来,通过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时段、重点因子,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四大结构”,重点治理燃煤、扬尘、机动车、工业企业“四类污染源”,空气质量稳定保持良好态势,全省打赢蓝天保卫战阶段性成效显著,被国家考核评价为良好等次。2019年,全省13个市州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20年前三季度,全省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5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3.6%;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2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4.2%,优于全国7微克/立方米;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3.2%,同比提高0.7

个百分点,优于全国6个百分点。对照国家下达甘肃省“十三五”期间PM2.5达到29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0.4%的环境空气质量约束,经测算,甘肃省已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任务。

全省百万贫困户住上安居房

2013年以来,我省投入补助资金126.67亿元,支持88.63万农户实施了危房改造。至2019年底,全省实现现有存量危房改造冲刺清零。2020年6月,我省对2013年以来136.3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情况进行了逐户现场核验,所有贫困户住房安全均得到保障。住房安全的全面提升促使贫困群众精神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有效提升了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振了贫困群众致富奔小康信心,促进了党群、干群关系融洽,社会和谐稳定,为全省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据悉,今年我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夯实脱贫攻坚产业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精准施策、强化调度、扎实推进,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持良好势头,全省完成建设面积260万亩以上。

2020年9月底,我省动员组织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在全省掀起高标准农田建设“百日大会战”。肃州区、玉门市、民乐县、安定区、静宁县、临夏县、景泰县及兰州新区积极探索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各具特色、亮点突出,推动实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大中型灌区建设、大型现代龙头企业带动、撂荒地复耕复垦、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吸纳农村劳动力等“五项结合”,高质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十三五”期间我省实施

棚户区改造82.76万套

“十三五”期间,我省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进度,全省共实施棚户区改造82.76万套,累计

完成投资1870亿元,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40万套的206.9%,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我省“十三五”期间共争取中央补助资金331.32亿元,落实省级配套资金38.81亿元,对符合条件的棚改项目给予贷款支持,共争取国开行和农发行棚改贷款资金1594亿元,争取到位棚改专项债券资金255亿元,为我省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提供了有力资金支持。

我省居民进入“扫码”就医时代

日前,我省已累计发放居民电子健康卡2020.26万张,发卡数占全省总人口的74%。全省272所公立医院、1611所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6167个村卫生室已接入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这意味着,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将帮助甘肃城乡居民在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机构看病无忧,是我省解决“一院一卡、重复发卡、互不通用”的就医堵点问题的有力举措。凭借这个二维码,我省居民可以接受从预约挂号到就诊,检查、检验、取药、结算、检验检查结果查询、处方查阅、疫苗接种以及家庭医生签约等服务,整个流程都可通过手机自助办理,实现看病就诊一卡(码)通用。同时,电子健康卡还关联个人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串联诊疗服务、健康管理、家庭健康指标等,为居民提供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等一体化电子健康管理服务。

我省东西部扶贫协作取得决定性成就

甘肃携手天津、福州、厦门、青岛四市,坚持把东西部扶贫协作作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力量,聚焦目标标准,贯彻精准方略,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更加健全、协作举措更加精准、协作成效更加凸显,呈现出帮扶力量由少及多、帮扶领域由浅入深、帮扶效果由好到优的转变,甘肃受援的5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东部协作市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我省无私援助。近五年来,累计投入我省财政援助资金达87.86亿元,实施协作项目4900余个。

(张雅丽/编 武新力/校)

加强省情研究 服务决策咨询

GAN SU SHENG QING

甘肃省情

2021 年第 1 期(总第 133 期)

2021 年 3 月 15 日编印

主 办: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编 印: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

排版印刷:甘肃金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730071

电 话:(0931)7768718

邮 箱:gsdxtsgckzx@126.com

印 数:1~1000 册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 456 号